

漢語史研究中心簡報

*The Briefing News of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主办

- ❖ 《高丽史》和《李朝实录》中的汉语研究资料..... 汪维辉 (1)
- ❖ 《老乞大、朴通事》的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夏凤梅 (30)
- ❖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刘丹青教授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36、37)
- ❖ 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39)
- ❖ 中国社科院沈家煊研究员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40)

2010年第1-2期(总第37-38期)

2010年6月



编辑部地址： 中国 浙江 杭州 浙江大学西溪校区行政楼四楼

邮政编码： 310028

电话(传真)： 86-0571-88273589

Email: hyshi@zju.edu.cn

印发日期： 2010年6月

印发份数： 250份

论文选刊

- 《高丽史》和《李朝实录》中的汉语研究资料……………汪维辉 (1)
- “《老乞大、朴通事》的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夏凤梅 (30)

学术动态

- 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大西克也教授来我中心作学术演讲…………… (34)
- 许建平教授赴台湾东吴大学任客座教授…………… (35)
-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刘丹青教授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一) …… (36)
-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刘丹青教授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二) …… (37)
- 吉林大学吴振武教授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38)
- 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39)
- 中心三位教授参加国际中国语学会年会…………… (39)
- 中国社科院沈家煊研究员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40)
- 我中心两位硕士生论文全省抽检获优秀…………… (41)
- 许建平教授应邀参加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教授诞辰 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42)

研究生动态

- 汉语言研究所第三届研究生论文报告会圆满结束..... (43)
- 我中心举行 2008 级古代汉语硕士毕业论文答辩会.....(44)
- 我中心四位博士顺利通过夏季博士论文答辩..... (45)
- 我中心举行 2008 级现代汉语硕士毕业论文答辩会.....(46)

论文选刊

《高麗史》和《李朝實錄》中的漢語研究資料

汪 維 輝

【提 要】 《高麗史》和《李朝實錄》等韓國史部文獻中蘊藏着豐富的漢語研究資料，文章從“白話資料”、“有關漢語教學的資料”和“其他有關漢語漢字的資料”三個方面舉例作了介紹。“白話資料”部分列舉了6段文獻，討論了與之相關的兩個問題，認為這些資料是口語的實錄，而非“轉寫”或“翻譯”；元代的“漢兒言語”明初仍在沿用，而且範圍可能不限於狹義的北方地區。“有關漢語教學的資料”部分分類列舉了關於明清時期“官話”的記載和關於學習漢語的記載，《高麗史》和《李朝實錄》中對漢語稱呼的記載反映了從“漢兒言語”到“漢語”再到“官話”的變化過程。“其他有關漢語漢字的資料”部分以“元—原”的字形更替為例作了說明，認為明代把“元來”等的“元”寫作“原”，主要是因為避朱元璋的名諱，跟嫌恨元朝可能也有一定關係。

【關鍵詞】 《高麗史》 《李朝實錄》 漢語研究資料 近代漢語 漢兒言語 明

初漢語 元一原

遠藤光曉先生指出：“在漢語史研究上韓國的漢文獻資料具有獨特的重要性。”¹實為卓識確論。除了學者們已經廣為利用的漢語口語教科書（包括諺解）、字書、韻書、詞語彙釋、借詞等“直接資料”之外²，像《高麗史》和《朝鮮王朝實錄》（以下簡稱《李朝實錄》）等史部文獻也蘊藏着豐富的漢語研究資料，我們不妨稱之為“間接資料”。這些資料有時可以補其他材料之不足，彌足珍貴。目前這些卷帙浩繁的史籍基本上還只是作為史料被漢語研究者零星地引用，專門的研究尚不多見³，值得深入挖掘和利用，以充分發揮它們在漢語史研究方面的價值。本文以《高麗史》和《李朝實錄》為例，分三個方面略作介紹，聊當嚆引。

一、白話資料

《高麗史》和《李朝實錄》中保存了一些白話資料，主要是明初洪武至永樂年間的皇帝口諭⁴，因為是“聖旨”，所以保持原樣。篇幅有長有短，長的多達數千字，對於研究明初的口語面貌有着重要的價值。下面酌引數段以見一斑。⁵

1. 《高麗史·恭愍王世家》“壬子二十一年”（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

（五月）癸亥，帝遣宦者前元院使延達麻失里及孫內侍來錫王綵段紗羅四十八匹。王出迎于迎賓館。中書省移咨曰：“欽奉聖旨：那海東高麗國王那裏，自前年為做立石碑祭祀山川，飛報各處捷音及送法服，使者重疊，王好生被暑熱來。為那般，我想

¹ 見《韓國的中國語言學資料研究》（韓·日中國語言學研究系列 1）遠藤光曉《前言》，[韓]學古房，2005 年 11 月，第 7 頁。

² 參看遠藤光曉（2008），竹越孝（2008）和遠藤光曉、伊藤英人、竹越孝、更科慎一、曲曉雲編《韓漢語言史資料研究文獻目錄（稿）》，載[日]遠藤光曉、[韓]嚴翼相編《韓漢語言研究》（韓·日中國語言學研究系列 2），[韓]學古房，2008 年 2 月。又，遠藤光曉、伊藤英人、鄭丞惠、竹越孝、更科慎一、朴真完、曲曉雲編《譯學書文獻目錄》，[韓]博文社，2009 年 9 月。

³ 我們目前見到的只有寺村政男（1998）和張全真（2005）兩篇文章。此外汪如東（2002）和梁世旭（2008）是對史部文獻《漂海錄》語言的研究，也可歸入本文所討論的範圍。

⁴ 參看張全真（2005）。張文對《高麗史》、《李朝實錄》（太祖、定宗、太宗三朝實錄）、《吏文》和劉仲環《遇恩錄》、《皇明詔令》、《高皇帝御製文》六種文獻中的白話聖旨收錄情況做過一個統計表，值得參考。據她的初步統計，《高麗史》和《李朝實錄》中屬於洪武、建文、永樂三朝的白話聖旨約有 13000 多字。

⁵ 筆者之所以不惜篇幅詳引原文於此，一是因為這些文字搜採不易，本身又具有很高的語料價值，或可供同道直接利用，二是為下文討論這些白話資料的語言性質提供方便。

着限山隔海、天造地設生成的國土，那王每有仁政，管撫的好時，天地也喜。我這裏勤勤的使臣往來呵，似乎動勞王身體一般。為那般上頭，我一年光景不曾教人去。于今恁每中書省省⁶收拾紗羅段子四十八匹，差元朝舊日老院使送去，選海船一隻，用全身掛甲的軍人在上面防海。就將那陳皇帝老少、夏皇帝老少去王京，不做軍，不做民，閑住，他自過活。王肯教那裏住呵，留下；不肯時節，載回來。恁省家文書上好生說得子細了。”右丞相汪廣洋又致書曰：“曩因元政不綱，群雄並起，各擁兵衆，分據土疆。我聖上乘時啓運，奮興淮右，肇基江左，命將四征，削平群雄。陳友諒竊據湖湘，妄稱大漢；明貞據有川蜀，僭號大夏。是以聖上統御六師，親臨湖廣。其陳氏勢窮力屈，率衆就降。去年春，命中山侯、潁川侯等總率師旅，水陸並進，直搗川蜀。明氏力不能支，銜璧請命。皆已欽蒙聖恩，特加赦宥，保全其生。然揆之以理，不可使久處京師。今令各將家屬往王國閑居。如可則留之，其不可則仍發回還。尚冀裁度。”（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⁷，24—25 頁）

以上“欽奉聖旨”部分是口語，“右丞相汪廣洋又致書曰”部分則是文言，對照之下，差別顯見。

2. 同上：

（九月）壬戌，張子溫、吳季南還。帝賜王藥材，親諭子溫等曰：“前年恁國家為耽羅牧子的事進將表文來呵，我尋思，這耽羅的牧子係元朝達達人，本是牧養為業，別不會做莊家有，又兼積年生長耽羅，樂土過活的人有。更這厮每從前殺了恁國家差去的尹宰相麼道。把這厮每遷將別處住去呵，怕那厮不知國王的好意思，疑惑著別生事端，所以不准來。今番這厮每又怎的如此作亂有！我如今國王根底與將書去有。恁到那裏，國王根底備細說者，休小覷他，多多的起將軍馬盡行剿捕者！我聽得恁那地面裏倭賊縱橫劫掠，濱海人民避怕逃竄，不能鎮遏，致使本賊過海前來作耗的上頭，我這裏戒飭沿海守禦官，見獲到前賊船一十三隻，有若耽羅牧子每與此等賊徒相合一處呵，剿捕的較難有。又聽得女直每在恁地面東北，他每自古豪傑，不是守分的人有。恁去國王根底說着，用心堤防者。又聽得恁國家疑惑大麼道。自古天下有中國，有外國，高麗是海外之國，自來與中國相通，不失事大之理，守分的好有。況今朝聘之禮不曾有闕，有甚麼疑惑處！昔日好謊的君王如隋煬帝者，欲廣土地，枉興兵革，教後

⁶ 疑衍一“省”字。

⁷ 本文引用時標點有改動，並據影印本校正了文字。下同。

世笑壞他。我心裏最嫌。有我這說的話，恁去國王根底明白說到。”又手詔曰：“七月二十五日張子溫至，表言耽羅牧子無狀，官吏軍兵沒於非命，深可恨怒。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今牧子如此，所當誅討。然國無大小，蜂蠶有毒，縱彼可盡滅，在此亦必有所傷。蓋往者之失，因小事而構大禍，惜哉！豈非烹鮮之急，情忌至甚而致然歟？事既如是，王不可因循被侮，其速發兵以討。然事機緩急，王其審圖之。”（同上，26—27頁）

以上“親諭子溫等”部分係口語，“手詔”部分則是文言。

3. 又“癸丑二十二年”（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

……二十日早朝，奉天門下面聽宣諭：“我前者恁衆官人每去太倉時，教開春禮部官去擡茶飯，緣故老院使并兩箇內侍我見不來，想這船風浪裏打將那里去了。隨後才方到來，有姓孫的內侍廢了，說病死了，自吊死了。說的差呵。我問的明白了也，恁那國王着帶刀的人每窗下門外看守，行里步里關防的緊呵。那火者說道：‘我是本國的人，怎的這般關防我？’說呵，姓朴的宰相不容說，打了一頓，更與了毒藥藥死，門里不敢將出，後牆上拖出去了。特的把帽子高掛在樹上，屍首吊在樹下，故意怕毒藥顯出，等的口内生蛆，才方交百姓來報。又駕船的軍人每根的也交多人關防。說與恁那國王：一年三四起家差人來進貢許多錢糧，我可無些少好勾當，因此上着老院使和兩箇內侍，與將些少紗羅段匹答禮，准當走一遭來。你可廢那一箇小火者，便有什麼光彩？休道是一箇，便是十箇也不打緊！這箇火者不是你那裏與將來的，又不是躲避差發來的，是元朝那里我尋將來的。休遠慮，休遠慮的深了。我如今把你放在船上，不教下岸來，恁心裏如何？恁每是打差使人，不干恁每事，說與恁那國王，既然疑惑我呵，修理城郭囤糧，準備弓箭砲石軍馬，便敢相敵。你這般使人來打細，濟甚事！我聽的你那里放著一箇破破陋陋城子，你且海東囤糧，多勞民力，不見民有益。倭人常川侵你，你便準備三五百船隻，交軍人捉拿，那的便是好勾當。我這里比你那里隔海，有倭人來，我差人也捉拿他里！為拿不的呵，將明州衛戴指揮、太倉衛徐指揮兩箇根的殺了。又差於指揮去根趕捉拿，將倭人年少的刺了口，更闔了它也，海上也乾靜了也。去年正朝使臣姓韓的四箇月到來，你為甚麼遲來？“風汛不好，不曾來的”，我的指揮問它，不會說漢兒言語，把這高麗人每擲了手脚，撇在水裏，⁸恁那宰相忙唾

⁸ 這幾句及下文的“見達達說達達話，見一般火者說高麗話，見漢兒說漢兒話”數句太田辰夫《關於漢兒言語——試論白話發展史》一文在討論“漢兒”問題時曾經引過（見《漢語史通考》187頁）。

了兩三唾：‘休，休！’可怎知道漢兒言語來？都是小見識。因此上早路里來了，他可要海路裏回去。我不曾著去。正意看我那山東一帶船隻軍馬動靜！今年正朝使臣四箇月前到來，不知怎的，的是正意來打細。前者一隻船七日到來我這龍江。件件事都如此。姓李的火者并達達、回回諸色人都來推做買賣打細。李火者來了兩三番也，見達達說達達話，見一般火者說高麗話，見漢兒說漢兒話。這般打細呵，怎中！我如今強如恁來打細，我這裏兩三處折了四五萬軍馬，我這裏是創立的天下，省臺官都闕少，恁那里與將廉幹識字人二三百名來。說與恁國王，我委付它省臺六部各衙裏做官人，不强如恁使人來做買賣打細！我交三年一遭來進貢，說來恁國王不志誠，忒疑惑，忒疑惑的多。交他休疑慮。因此上恁每如今連三年依舊累來。之後可三年一遭來進貢，這二三百人送盤纏來往取信，不强如恁來打細，使小見識？有一小節事：姓周的女孩兒，從元朝尋將他來。問呵，他說姓朱，俺容不得他。問他父呵，却說姓周，我如今留了他也。想恁來十三歲的小孩兒會喫爛，恁可早送與了人，有失子母之情。他父一去之後，並無信息，有失父子之情。你又把他爺來遠流去了。恁每做的事忒小見識，遠慮，遠慮的深了。當年恁那國王呈將文書來，不見了他的姪女兒，我便使使臣到處裏尋將來，與將去了。姓金的火者回來，話說的不明白，今番殺了他也。休小見識，志誠者！恁這一姓王子數百年，休教失了便好。我難道征不征。有我的兩箇小厮利害，恁似這般不志誠，小計量，他後來要征恁去呵，我便是失信一般。我如今征不征不敢說。不得不如此。恁來呵也由恁，不來呵也罷。我如征恁去呵，明州造海船五百隻，溫州五百隻，泉州、太倉、廣東、四川三個月內脩造七八千隻船，明白征去也者。我不似恁波皮王，交火者龍福鋪馬上搏出來，那的呵，是他的駙馬，為這般上頭，擲出他來了。我可不那般的，休疑惑我。我從二十四歲上，紅軍內住子三年，自家砌了些个軍馬，脩了一座城子，海內打造了一萬船隻，後來各處城郭都收拾了。又大元也趕的迤北去了。我如今胡人也不曾遠去，我那里雇（顧）的恁！那明日後日把達達每拿的拿了，趕的趕了，天下寧靜之後，桑麻滿園，四方富貴，那其間論外國之罪也者！中國之亂，諸侯之福也。我是一个農家，與我中原作主；恁是箕子之國，新羅、樂浪郡相敵，擄了平[民]⁹百姓，如今恁便都做了恁的奴婢。在先唐太宗征恁不得，他每不會征，後高宗都滅了恁國來！在後關先生那波男女，不理法度，只要貪淫，以此上他也壞了。因那上頭，恁隄防的是也。我可不那般的，明白征恁去。洪師範是恁那里惹

⁹ “民”字從吳晗輯本臆補。

大一介官人，又是王的親，水裏滄死了，皆是一人所作。昨是留下這些个人，若不留
下呵，則道是我這里把截軍官每見他許多財物，廢了他性命。恁國王想也者，恁每使
人遼東等處與吳王相擡茶飯，并布一百匹，茶飯吃了，布子不曾收回，與將去了。算
起來每匹布該米三担，通計三百担，兀的也是錢糧，那里是把茶飯？正意打細！恁將
著千餘匹馬來販賣，又夾帶着納哈出的伴當，來看我軍營裏事。恁透與他消息，搶了
我牛家莊馬頭十萬糧，更折了三千軍馬。恁那里進來的表上說道，‘俺每子子孫孫世
世稱臣來’，臨了做這般勾當，小見識！又與徐總兵擡茶飯，不是真意，故意打聽北
平府軍官事跡。你那般小見識，怎生使的？以小事大，古之禮也，為甚是不志誠？濟
州馬匹，今日將來，明日將來，鬧了一年，則將的四个馬來了。不知怎的的事！做買
賣來的人每將不答緊布、席來，却不將一个馬來販賣，阿的都是恁的小計量，比人身
上有一个小瘡，不看覷呵，到大難醫治有。恁到太倉，三月內風汛好呵，回去對恁國
王根前說者，更休聽小人言語。姓朴的宰相，姓周的女孩兒父親親眷與將來者，國王
根前行的火者四五个，與將來者。恁這幾箇官人每姓甚？去年姓洪的海面上壞了船隻。
見海上難過，有許多艱難，與恁船隻脚力，教恁官人每往登州過海，三个日頭過的。
今後不要海裏來。我如今靜海，有如海裏來呵，我不答應。恁如海裏來的廉幹好秀才
吏員，著小船上送將來，我便答應。不要貪的來。今後其餘的海裏，不要通連。說與
恁國王，恁那頭裏的意思好生志誠來。志誠的過了，反疑的多了。你這般疑慮計較，
到不好了。我從前差去的人，你解的我意，我差人呵，不肯差漢兒人，都是你那里本
國人。恁每問我這里事體動靜，它不敢不說與恁。我恰三五年的國土，則是一二年的
火者，這火者與我十二三年也，恁可廢了他！達麻失里院使，它是元朝的火者，我頭
里來不要它，教它舊城裏閑住來。聽它精細呵，我教他內裏來住了。差恁那里去來，
那里肯不說我這里動靜備細？我中國使臣使將去了，打死了，我再不使將人去。恁有
心來呵，來；無心來呵，休來。我前者使將一隻船去呵，許多軍馬接待，那里有那般
體禮！休道一隻船，十隻船去呵，怕甚麼！我聽的倭賊二三百里田地入侵，不理論，
放著破破的城子，不脩理城池，疑惑我則麼？我征恁呵，明白征恁。胡人趕的遠去了
呵，五年征不得呵，十年征。恁有心來呵，來；無心來呵，休來。說與恁國王者。”
中書省咨曰：“洪武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准來咨差陪臣密直司同知金湑等進賀洪武六年
正朝表文，貢獻方物。又准咨差陪臣贊成事姜仁裕等進謝恩表文，貢獻方物馬匹。當
月二十三日禮部官奏聞，將引來使於奉天殿引見訖。欽奉聖旨：‘高麗國王那里，已
先為使臣每去得重疊呵，國王迎接生受，曾被暑熱來，以此上多時不曾教人去。近日
因延答里麻失里送將明昇等家小去時，曾教你中書省將這意思寫與國王知道。他却每

年數次遣人將金銀器皿等物來貢獻呵，這等禮物，未免勞煩百姓。況兼使臣往來經涉海洋，甚是艱險，且如近日洪師範回到海上，遭風損壞船隻，將他淹死了。幸而存得幾箇人，知得分曉；若都無了時，豈不費分說？我想古來中國諸侯於天子，每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至如九州之外，蕃邦遠國，只每世一見，其所貢獻，不過納贄表誠而已。今高麗去中國稍近，文物禮樂通經史與中國相似，難同其他蕃邦，教他依著三年一聘之禮，或欲每世一見亦可。你中書省將我的言語，行文書與高麗國王說知，今後將來的方物，只土產布子不過三五對，表意便了，其餘的都休將來。其他蕃邦遠國，如占城、安南、西洋鎖里、爪哇、勃泥、三佛齊、暹羅斛、真臘等處，新付的國土，也頻頻遣人來，亦勞那里百姓，他來時也說與他，只依古人的禮。’”又咨曰：“欽奉聖旨：‘如今天下各衙門，凡遇我生日及正朝、冬至，都進將表文來，好生禮煩。冬至古無賀禮，今後不必進表。歷代帝王不曾做生日，只起自唐玄宗。今後我生日不要進表，東宮生日亦不要進箋。唯正朝乃一歲之首，各處所進表文，類進將來。’”……咨曰：“……欽奉聖旨：‘高麗國王欲令子弟入國學讀書。我曾聞唐太宗時，高麗國亦嘗教子弟入學，這的是件盛事。又想這子弟每遠來習學呵，在這裏或住半年，或住一年，或住年半，迺回家去。交他回去，雖然聽從其便，但為本國遠處海東，比至京師，水路經涉海洋，陸路不下萬餘里，隔離鄉土，為父母必懷其子，為人子必思其親，此人之常情。恁中書省回文書去，交高麗國王與他臣下每好生熟議。若是乃為父母的願令子弟入學、為子的聽受父母之命來學者，交高麗國王差人好生將來。省家回的文書要說的明白。’”（同上，28—34 頁）

朱元璋的這幾段口諭，長達三千多字，說得羅羅嗦嗦，如敘家常，完全是口語的實錄，讀來如聞其聲。其中有些詞句頗不易懂。

4. 又《辛禍列傳》“十一年”（明太祖洪武十八年，1385）：

安翊、張方平等回自京師，欽奉宣諭曰：“天下到處亂的時節，我出來了，收捕了天下，着恁四夷知道的上頭，差這里的人呵不的當，所以原¹⁰朝行來的火者，他鄉中有親戚爺娘，到那里呵，我這裏的句當，甚麼不說？為那般上頭，差幾介火者去了來。恁那先王至誠呈表來，後頭凡百不至誠的上頭，不交恁來往來。後頭差將人呵，皇太子生日也趕不上，九月十八日我的生日也趕不上。洪尚載進年表來呵，又正月裏來的上頭，不得無罪，貶的雲南去了來。歲貢如約的上頭，病死的死了，有的都着回去了

¹⁰ 吳晗注：“當作‘元’，避明太祖諱作‘原’。下文同此。”按，吳說是。詳下。

來。今番開去的詔書呵，不曾着秀才每做，都我親自做來的，到那里看，不曾移改恁風俗，自依恁那里行。今番將來的馬呵，那里有我騎的？口說至誠，心不至誠，直甚麼事！至誠呵甚麼里顯至誠？以物顯至誠有！事不得人，何能事鬼神？歲貢呵，預前一發揍（湊）辦，將來時節，恁路上艱難，俺這里收呵也不便當，一年一年家將來！說與恁那宰相每，好生整理百姓。恁這使臣每呵，我這里說的言語，到那里件件說不到，乍（怎）麼算使臣！”又奉宣諭曰：“恁那里倭賊定害那不定害？我待將軍船搶解倭賊海島去，徑直過海到那里，不知他那里水脉。金州裝糧過恁地境，著知路人指路，到那里搶解了呵，回來，他來的口子裏足乍營守御。”（同上，65—66 頁）

5. 又“十三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

（五月）僕長壽還自京師，欽奉宣諭聖旨曰：“你那高麗的事，也有些不停當。不知你那里古典如何，我這中國古典裏看起來，件件都是他自取的。當初我即位之後，便差那裏土人元朝火者、官人每去動問王，只想他是你土（土）人，我這裏匙大碗小都知道，交仔細說與你。不想把一箇火者殺了。後頭王又弑了。為這上不要來往。問甚三綱五常有無，教他自理會。幾年家却只管要臣屬，疊疊的來纏（去聲）。這箇意也有甚難見，只想道這一枝軍馬別處都定體了，必來征伐也。你都猜差了。我的意是實實的意，我的手詔恰便是說誓的一般，說道‘若非肆侮于邊陲，朕安敢違上天之命’云云。你後頭只管來纏，我便道，既要聽我的約束，比似俺中原地面，各有歲貢，因此教每年進一千馬、金銀布匹。却便不如約了。中國豈少這些？但試他那心。臨了艱艱澀澀辦了五千馬——前後也該六千——至誠處却也有了。隨後便來訴難，我與他一發都除去了，只教三年進五十匹馬表誠，是一百分中只取他一分。你便至至誠誠將些好的來，教百姓看了，也道是高麗來進的馬。且休問中騎不中騎，你怎看那樣子！為那上我惱了，教再來絕交，與將文書去了，你曾見麼？高麗自古出名馬。近間來進的馬，都恰好。只伯顏帖木兒王有時進了些好馬來與我，那馬却是好！我今番為征進用着些馬，想那裏也缺少些段匹，為這般，教和買些馬去。你便教各官家人送馬到遼陽，要將段子、絛布做些襖子、衣服穿，却不至誠！你便使將兩箇小廝來說，“不敢受價”，便是不誠處：這般是我欺你，問再乾要馬！這箇意思如何？先番幾箇通事小廝每來，那裏說的明白！你却是故家子孫，不比別箇來的宰相每，你的言語我知道，我的言語你知道，以此說與你，你把我這意思，對管事宰相每說，大槩則要至誠，倒不要許多小計量。你那裏合做的勾當，打緊是倭子，倒不要別疑慮，只兀那鴨綠江一帶，沿海密匝匝的多築些城子，調些軍馬守住了一壁廂，多造些軍船，隄備著百姓些福。至至誠誠的做著行呵，雖百萬兵也難近你。大抵人呵容易欺，神天難欺有。你說與那宰相

每，他每喫的是百姓的，穿的是百姓的，享榮華富貴，交他也思量與百姓造福，保守那三韓一方之地，誰似恁快活！休只管小計量，明日神怒人怨呵，不好也。我這中國的事，只做買賣來的人，也儘可以知得，何必則管差使臣來？今日也弔筆頭，明日也弔筆頭，一箇來說一團（上聲），有甚好處？你只依著三年一遍家差人進貢，我若怪你三年一遍來，便是朝廷的不是。我如何肯怪你？你是故家，我所以仔細和你說，你記著者。當初雲南王他若依本分，守著他那一塊地面，我也不征他。他却守分，我這裏的逃軍，他招誘將去了，罪人他藏匿了，只管生邊釁，因此我教征伐他，都平定了。大抵不生事呵，有甚話說！耽羅我也本待買些馬用來，再尋思，不中，不必買了。為甚麼？假如我這裏海船到那裏，有些高高低低，生起事來，又不得不理論，例（倒？）也不必買了。耽羅原屬原朝，來的馬教我區處，我却不肯。我若要取勘呵，頭裏便使人去了。我若取勘了，又少不的教人去管。既人去管，便有高高低低，又生出事來。我決然不肯。那耽羅近恁地面，則合恁管，我不肯取勘他。恁回去說與他管事的宰相每，大剛只要至誠，保守你那一地方，休來侮我。我明日差人往遼陽為馬價的事去也。我的言語你記著，說到者。”又宣諭聖旨曰：“我前日和你說的話，你記得麼？”長壽奏：“大剛的聖意，臣不敢忘了。只怕仔細的話記不全。這箇都是教道將去的聖旨，臣一發領一道錄旨去。”聖旨：“我的言語，這里冊兒上都寫着有。大抵我的話緊則要他至誠。那里豈無賢人君子，必知道這意也。你對那宰相每說，他只是占田土，占奴婢，享富貴快活，也合尋思教百姓安寧，至至誠誠的做些好勾當，密匝匝的似兀那羅州一帶築起城子，多造些軍船，教倭子害不得便好。你却沿海每三五十里家無人烟耕種，又說倭子在恁那一箇甚麼海島子裏經年家住，也不回去，恁却近不得他。這的有甚難處？着軍船圍了，困也困殺那廝！這等都是合作的事，你說與他。你是舊是（時？）宰相家子孫，必是聰明，這等話與我說道者。昨日為馬價的事，差人遼陽去了，教看來的馬，直兩箇段子八箇緜本（布）的，或不直這個價錢的，一个个分揀着，務要與各官送馬來的家人回去。耽羅我也想教些船去，不要一時拋在那里。只離那里二十或三十里，往來周回搶着，逐一箇拋者買了便回來。我又尋思不便當，恐又生出事來，不免又動刀兵，以此不買去了。原朝放來的馬，只恁管，我不差人。我要差人時，一頭得了大都，便差人管去了。大槩人不才的多，若差一箇不才的人到那里，那廝倚著朝廷的勢力，倚恃着朝廷的兵威，無所不為起來，便是激的不好了。我決然不差人，却也地面近恁那里，和羅州廝對著，從來恁管，只合恁管。我常相（想）漢光武時，四夷請官，光武不許。蓋是光武從小多在軍旅中，知道許多弊病，所以不許他。這是光武識見高處。後來的君王多差了。便如高麗，也都分為郡縣，設置官守。後頭

也是那不才之人，恃倚朝廷威勢，做的不好，都激變了。却因朝廷事多，就不暇整理他了。則今番兀都¹¹那雲南，我本不征伐他，他却如常生邊釁，以此無乃（奈）何去征他。調了二十二萬軍馬，和餘丁二十七萬，平定之後，帶戰亡逃病，折了我五萬兵！一萬里遠，接連著吐番一帶，用熱（倨）多軍馬去守，又無益於中國。征伐之事，蓋出於不得已。你回去疊疊的說與他，交至誠保守那一方之地，休要侮我，這中國有甚話說？若不至誠，不愛百姓，生邊釁，這等所為呵，我却難饒你！我若征你，不胡亂去，一程程築起城子來，慢慢的做也。你是故家，我所以對你仔細說。休忘了，與他每說道這意思者。”長壽叩頭。聖旨：“如何？你有甚說話麼？”長壽奏：“臣別無甚奏的勾當，但本國為衣冠事，兩次上表，未蒙允許，王與陪臣好生兢惶。想著臣事上位二十年了，國王朝服、祭服，陪臣祭服，都分著等第賜將去了，只有便服不曾改舊樣子。有官的雖戴笠兒，百姓都戴著了原朝時一般有纓兒的帽子。這些个心下不安穩。”聖旨：“這個却也無傷。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不害其為賢君。我這里當初也只要依原朝樣戴帽子來，後頭尋思了：我既趕出他去了，中國却蹈襲他這些个樣子，久後秀才每文書裏不好看。以此改了。如今却也少不得帽子，遮日頭、遮風雨便當。伯顏帖木兒王有時我曾與將朝服、祭服去。如今恁那里既要這般，劈流撲刺做起來，自顧戴——有官的紗帽，百姓頭巾——戴起來便是，何必只管我根前說？”長壽奏：“臣來時，王使一个姓柳的陪臣直趕到鴨綠江，對臣說：‘如今請衣冠的陪臣回來了，又未明降，好生兢惶。你到朝廷苦苦的奏。若聖旨裏可憐見呵，你從京城便戴著紗帽、穿着團領回來，俺也一時都戴。’臣合無從京城戴去？”聖旨：“你到遼陽，從那里便戴將去。”（同上，71—75 頁）

朱元璋與僕長壽的這段談話，也長達兩千多字，從“大剛的聖意，臣不敢忘了。只怕仔細的話記不全。這箇都是教道將去的聖旨，臣一發領一道錄旨去”的話來看，應該是朱元璋身邊的侍臣據實記錄後讓僕長壽帶回高麗去的。¹²雖然僕長壽的漢語很好，但是記憶力再強，事後追記恐怕也不可能記得如此詳盡，當場記錄則幾無可能。朱元璋所說的“我的言語，這里册兒上都寫着有”，則應該是指用文言寫的書面聖旨

¹¹ “都”字疑衍，蓋與“那”形近誤寫而未刪去。

¹² 當時皇帝的口諭都是有“錄本”的，詳下文。承真大成博士函告：出使外國，與對方君臣會談之後，將談話記錄下來，自古即有。《南齊書》卷四七《王融傳》：“但聖主膺教，實所沐浴，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啓》、《三日詩序》、《接虜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又卷四八《劉繪傳》：“後北虜使來，繪以辭辯，救接虜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這種“語辭”應當就是會談記錄。

(如上面第 2 段的“手詔”部分), 上文提到“我的手詔恰便是說誓的一般, 說道‘若非肆侮于邊陲, 朕安敢違上天之命’云云”, 正是用的文言。

6. 《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實錄》:

辛卯, 遼東千戶王得名、百戶王迷失帖等奉勅書至, 上以冕服率群臣迎于西郊, 至闕開讀: “皇帝勅諭東寧衛漫散官員軍民人等: ‘太祖皇帝開設東寧衛, 好生安養你每。後來建文苦得你每沒奈何, 漫散出去。如今天下太平了, 我只遵着太祖皇帝的法度安養你每, 都回來東寧衛裏來住, 官仍舊做官, 軍仍舊做軍, 民仍舊做民。打圍、種田、做生理, 聽從所便, 休要害怕驚疑。若一向執迷, 漫散不來, 恐久後悔時遲了! 故勅。’”

建文三年六月十二日, 本府官將二次奏呈事理於奉天門題奏, 奉聖旨: “恁都府便將文書與朝鮮國差來使臣齎回去, 說與國王知道: 但是這等逃去的人, 着他那裏挨究, 都拿將出來, 差人送與遼東都司, 休要容留他。欽此。”

使臣黃儼等齎來宣諭聖旨內: 永樂元年二月初八日奉天門早朝, 宣諭聖旨: “建文手裏多有逃散的人, 也多有逃去別處的, 有些走在你那裏。你對他每說知道, 回去對國王說, 一介介都送將來。” 同日, 禮部尚書李至剛於本部說道: “上位有聖旨: ‘但是朝鮮的事, 印信、誥命、曆日, 恁禮部都擺布與他去。’ 外邦雖多, 你朝鮮不比別處。君臣之間、父子之際, 都一般有孝順識理的孩兒, 有五逆不孝不識理的孩兒。不識理的孩兒有不是處呵, 不恠他。識理的孩兒九遍至心孝順呵, 一遍有些不是處, 連那九遍的心都不見了。如今上位件件事都依效着太祖行, 每日把那洪武二年、三年以來發去外邦的文書、外邦來的文書、太祖做的詩都每日看。你那裏也將洪武二年、三年以來文書字(仔?) 細看: 幾時的文書有好話, 幾時的文書有恠的話。恐怕因走去的小人兒有些不是處, 把從前的孝順都不見了。這件最是打緊的事。你把這旨意的話對國王說, 休要撤了上位的厚恩。” (太宗 5 卷, 3 年(1403 癸未/明永樂 1 年))

此段所錄為永樂元年明成祖朱棣的口諭聖旨和禮部尚書李至剛的話。

這些聖旨(包括少量大臣的話)大抵原本就是用白話記錄的, 這從上面所引的片段中可以得到證明。雖然是當時的大白話, 但是今天讀來有些地方已經不好懂了, 所以吳晗先生的斷句和標點時有欠妥處, 韓國的電子版《朝鮮王朝實錄》則問題更多。

對於以上這些白話資料, 有幾個問題需要提出來討論。

第一, 這些資料究竟是口語實錄, 還是經過“轉寫”或“翻譯”?

關於這個問題, 學術界有不同看法。這關係到這些資料的語言性質及其利用價值, 是必須弄清楚的重要問題。這裏我們著重就張全真(2005)提出的一些看法加以討論。

先引張文的相關論述於下：

根據《高麗史》中的記錄，可以推斷出白話聖旨源於高麗與元朝交往的傳統。據《高麗史》記載，元朝給高麗朝廷的外交文書多採用白話聖旨。¹³明初，白話聖旨繼續使用。從史籍中的記載分析，這些白話聖旨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明初為打消高麗的疑慮，派遣前元舊使出使高麗，這些使臣到高麗或朝鮮出使時，沿用前元傳統，準備兩份文件，一是公文形式的文言聖旨，一是轉達皇帝口諭的白話聖旨。¹⁴二是探聽意向的高麗使者或朝鮮使節到明出使，回國後習慣把文言聖旨及皇帝接見時談話記錄全部記錄在案。高麗朝鮮使臣記錄明帝話語的原因在於出使中國的時候，他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探聽大明皇帝的意向。所以除了領受皇帝的手詔之外，還要記錄皇帝說的話¹⁵，復命時將記錄的白話聖旨及受領的文言聖旨一起交給朝廷。由於高麗及朝鮮初期對元和明雙重關係的複雜性，朝廷中一直有親元派和親明派。對明始終有戒心和猜疑甚至抵觸，而文言聖旨中多是冠冕堂皇的外交辭令，所以從某種意義上麗末鮮初國王們往往對使臣記錄的皇帝的話語比文言的手詔更為重視。不過談話記錄類型的聖旨，由誰記錄、怎麼記錄決定了這些文獻的語言特點，也是本文討論的重點之一。

1. 具有漢兒言語特點的白話聖旨

根據我們的研究，朝鮮文獻中保留的明初白話聖旨並不一定反映當時皇帝或者明初統治者的口語。《高麗史》有些聖旨帶有某些漢兒言語特點，時間為高麗與明朝交流初期，例如：

（洪武五年九月）壬戌張子溫吳季南還，帝賜王藥材，親諭子溫等曰：

前年恁國家為耽羅牧子的事，進將表文來呵，我尋思這耽羅的牧子係元朝達達人，本是牧養為業，別不會做莊家有。又兼積年生長耽羅樂土過活的人有，更這厮每從前殺了恁國家差去的尹宰相麼道。（《高麗史》上 848d）

這種聖旨的語言，出現“有”、“麼道”等特點與《遇恩錄》等記錄的朱元璋的

¹³ 關於元代白話聖旨的語言，歷史界的學者如宮紀子等認為，元代白話聖旨中的漢兒言語的語言多是譯官根據蒙古語翻譯的，有很多硬譯漢語的特點。不過無論是元朝廷直接用漢兒言語寫成，還是高麗翻譯機構把蒙語翻譯成符合當時北方口語特點及高麗人閱讀習慣的漢兒言語，記錄在史冊的語言，應該是元末具有一定的溝通基礎在中國北方比較通行的漢語口語形式。《高麗史》中記錄的此類聖旨不多，參見《高麗史》上 458b-459b 及《高麗史》上 459B-460b。

¹⁴ 著恁四夷知道的上頭，差這裏的人呵不的當，所以原朝行來的火者，他鄉中有親戚爺孃，到那裏呵，我這裏的勾當甚麼不說？為那般上頭，差幾介火者去了來。（《高麗史》下 929d）

¹⁵ 維輝按，此話目前看來尚缺乏直接的證據。據可考的文獻來推測，這些白話聖旨應該是由明廷的記錄官記錄下來的。

語言特點顯然不符。大概是用漢兒言語轉寫而成，跟舊本《老乞大》中反映出的語言特點很像。雖然這段話是由朝鮮使臣自己翻譯還是由明政府譯官加工製作，還不太清楚，¹⁶但其中明顯地反映了漢兒言語的特點，不能作為我們研究明初聖旨中白話特點的憑據。明初通行的白話與漢兒言語的差距之大在《實錄》等文獻中多有反映。雖然漢兒言語體的聖旨只是高麗與明交往初期的個別現象，但反映出了早期習慣用蒙式漢語的高麗及朝鮮官員們與明交往時一定的困難。朱元璋對高麗使節使長壽抱怨說：“先番幾箇通事小厮每來，那裏說的明白。你却是故家子孫，不比別箇來的宰相每。你的言語我知道，我的言語你知道，以此說與你。你把我這意思對管事宰相每說大概。”（《高麗史》下 939a）即使是以前高麗的舊臣，曾經是前元翰林的使臣言語也不能與大明皇帝直接溝通：朝鮮太祖五年，發生“言語不敬”官司後，前元及高麗舊臣李穡主動請求出使，“太祖遂以穡為賀正使”“以殿下為書狀官”隨行。“天子素聞穡名，引見。從容語曰：‘汝事元朝為翰林，應解漢語。’穡遽以漢語對曰：‘親朝天子未曉其志。’¹⁷問曰：‘說甚麼？’禮部官傳奏之。穡久不入朝，語頗艱澀。天子笑曰：‘汝之漢語正似納哈出。’¹⁸”（《太祖》卷九 7b）這件事在尹根壽（1537—1616）《月汀集》中也有記載。¹⁹由此推斷，明初高麗、朝鮮朝廷使用的是元代通行的漢語，這種漢語與明初的語言有很大的差距。²⁰

¹⁶ 因為在其他明代文獻中也有洪武年間給西北外族用漢兒言語寫成的聖旨，如《高皇帝御製文集·諭西番東畢里等詔》：奉天承運的皇帝教說與西番地面裏應有的土官每知道者：俺將一切強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子裏坐地有。為這般上頭，諸處裏人都來我行拜見了，俺與了賞賜名分，教他依舊本地裏面快活去了。似這般呵，已自十年了。止有西番罕東、畢里、巴一撒，他每這火人為什麼不將差發來？……俺便教你每快活者，不着軍馬往你地面裏來，你西番每知道者！（洪武十年六月二十四日）維輝按，這道詔書確實是用漢兒言語寫成的，但可能是文臣按照朱元璋的意思寫的，未必是對他的原話的直接記錄，跟明朝皇帝直接對高麗和朝鮮使臣當面談話的口諭性質不同，恐怕不宜一體看待。¹⁷維輝按，這段話在《李朝實錄·太祖實錄》的另一處記作：至京師，天子素聞穡名，從容語曰：“汝仕元為翰林，應解漢語。”穡遽以漢語對曰：“請親朝。”天子未曉，曰：“說甚麼？”禮部官傳奏之。穡久不入朝，語頗艱澀。天子笑曰：“汝之漢語，正似納哈出。”（太祖 1 卷，總序）所以這裏的斷句恐怕應該是：穡遽以漢語對曰：“親朝。”天子未曉其志，問曰：……。

¹⁸ 北元太尉，明亡後繼續與高麗交好。後降明，封海西侯。（洪武十年六月二十四日）

¹⁹ 牧隱麗末以首相自請赴京。以欲見高皇帝，將有所為。恐太祖致疑，以太宗自望書狀官而帶行。洪武皇帝以牧隱元朝翰林，見之而欲語，牧隱以扶護本國事為言。皇帝謬若不解，聽者而曰：汝之漢語正似納哈出。（《韓國文集叢刊》47 冊《月汀集·別集》卷四 373 上）

²⁰ 維輝按：僅據這條材料並不能證明“明初高麗、朝鮮朝廷使用的是元代通行的漢語，這種漢語與明初的語言有很大的差距”，因為原文只說“穡久不入朝，語頗艱澀”，是由於他個人漢語水平有限而出的洋相，並不牽涉明初高麗、朝鮮朝廷使用的漢語本身。另外，假如“明初高麗、朝鮮朝廷使用的是元代通行的漢語，這種漢語與明初的語言有很大的差距”，那麼朱元璋和使長壽的談話也一樣會發生困難，而朱元璋對使長壽說的卻是：“你卻是故家子孫，不比別個來的宰相每，你的言語我知

所以交往初期，將明初通行的白話翻譯成具有漢兒言語特點的文書也就不足為奇，研究中應該對這些文獻中反映出的語言特點和其他文獻區別對待。其實質是轉寫的白話聖旨。

2. 應高麗朝要求而特製的明初通語體白話聖旨

瞭解到高麗朝要求的朱元璋為了更好溝通，允許高麗和朝鮮使者帶回由朝廷記錄的白話聖旨，並指出聖旨是他親自做的。

今番開去的詔書呵，不曾著秀才每做，都我親自做來的。到那裏看，不曾移改恁風俗，自依恁那裏行。（《高麗史》下 929d）²¹

又，使臣帶回的是由明一方記錄整理的聖旨：

長壽奏：“大剛的聖意，臣不敢忘了，只怕仔細的話記不全，這箇都是教道將去的聖旨，臣一發領一道錄旨去。”聖旨：“我的言語，這裏冊兒上都寫着有。”²²（《高麗史》下 939a）

在《高麗史》和《吏文》中同時收錄的比較早期的“子弟入學書”的聖旨據《高麗史》載，第一次帶回時路上遇難，是由後來的使節回到中書省，重新抄錄帶回的。²³又據《遇恩錄》中記載，朱元璋對大臣們是否忠實記錄自己的語言非常在意，這可能也是洪武朝多白話聖旨的原因吧。²⁴

言語官司引來朝鮮對漢語、吏文等學習的更加重視。隨着通婚及溝通的增進，白話聖旨逐漸減少。建文朝及朝鮮定宗時間短，保留不多。永樂朝繼續用白話聖旨形式，但從量上看遠不如洪武朝多。永樂後期到宣德、正統年間，白話形式的聖旨逐漸減少，有時只是簡單一句話，有時夾雜了大量文言。明初時表現出的明對高麗朝鮮行文遷就的潮流在短時間內即被朝鮮王朝自願學習漢語吏文、行文習慣逐漸靠攏所代替。這種

道，我的言語你知道，以此說與你，你把我這意思，對管事宰相每說。”可見還是個人漢語水平的問題。僕長壽是華裔貴族的後代，漢語水平很高，跟朱元璋對話毫無問題，所以朱元璋才說“不比別個來的宰相每，你的言語我知道，我的言語你知道”。

²¹ 維輝按，這裏朱元璋說“今番開去的詔書呵，不曾著秀才每做，都我親自做來的”，恐非指白話聖旨，而是用文言寫的。詳上文。

²² 維輝按，這裏朱元璋所說的“我的言語，這裏冊兒上都寫着有”，恐怕也不是其口諭的實錄，而仍然是指用文言寫成的聖旨。詳上文。

²³ 夢周去年四月，同師範到京師，受中書省咨文二道。一為平蜀及子弟入學書，一為雅樂鐘磬事。八月還至海中許山，遭風，船敗，師範溺死。遂失咨文。夢周復如京師告中書省，鐘磬咨文省官以草本遺失不許，只抄寫平蜀及子弟入學回咨以來。（《高麗史》上 852d）

²⁴ （洪武二十四年）二十八日欽奉聖旨：“着記事。有不是我口裏說的說話，他每胡添上時，尔便來說。傳聖旨宣喚人。”（《遇恩錄》）這段話是朱元璋對劉仲環說的。

變化使得朝鮮文獻中保留的白話聖旨逐漸減少，世宗實錄中已數量不多，《吏文》中保留了一些。其他文獻中永樂後的明代白話聖旨也比較少見。

明初的口語表現出漢兒言語的傾向。白話聖旨雖然並不是百分之百反映當時皇帝或者明初統治者的口語，但無論是採用前面提到漢兒言語體或明初的通語口語體，落實到書面上，都是當時可以溝通的比較通用的官話變體。

張文對明初多用白話聖旨的歷史淵源和原因的分析是中肯的，指出“有些聖旨帶有某些漢兒言語特點”，“出現‘有’、‘麼道’等特點與《遇恩錄》等記錄的朱元璋的語言特點顯然不符”，“跟舊本《老乞大》中反映出的語言特點很像”，也是正確的；但是，認為“其實質是（用漢兒言語）轉寫的白話聖旨”、“並不一定反映當時皇帝或者明初統治者的口語”，筆者卻不敢苟同。我認為朝鮮文獻中保存的這些白話聖旨都是明朝皇帝口語的直接記錄，不存在用漢兒言語“轉寫”或“翻譯”的問題。除了上面引用張文時已隨文所作的一些說明外，這樣說還有以下幾個理由：

一是“聖旨”的神聖性。誠如張文所說，“朱元璋對大臣們是否忠實記錄自己的語言非常在意”，按通常理，皇帝的口諭是不允許被隨便改動的。元朝皇帝的口頭聖旨需要“翻譯”成漢語（如元代白話碑），那是因為他們的原話是用蒙古語說的，而朱元璋和朱棣他們本來說的就是漢語，沒有“轉寫”或“翻譯”的必要。

二是這些資料中有許多可以證明其為口語實錄的內證。比如“親諭子溫等曰”這樣的提示語、“有我這說的話，恁去國王根底明白說到”、“你是故家，我所以仔細和你說，你記著者；我的言語你記著，說到者”這樣的叮囑語²⁵，這些記載明白地告訴我們，這就是對口語的真實記錄。又比如其中記錄了一些生動的口語語彙和音變現象，如果不是“實錄”，是不可能做到如此逼真妙肖的：只想他是你土（土）人，我這裏匙大椀小都知道，交仔細說與你|久後秀才每文書裏不好看|如今恁那裏既要這般，劈流撲刺做起來，自顧戴|今日也吊筆頭，明日也吊筆頭，一箇來說一團（上聲），有甚好處？|幾年家却只管要臣屬，疊疊的來纏（去聲）|昨是²⁶留下這些箇人，若不留下呵，則道是我這裏把截軍官每見他許多財物，廢了他性命|做買賣來的人每將不答緊²⁷布、

²⁵ 最為突出的當數朱元璋和僕長壽的那段對話，上文已引，這裏不重複。

²⁶ 昨是=早是，是口語音變的真實記錄。“早是”意為多虧、幸虧、幸而，下文“幸而存得幾箇人，知得分曉；若都無了時，豈不費分說”，作“幸而”可證。此詞元明文獻中多見，又寫作“蚤是”（參看王學奇、王靜竹《宋金元明清曲辭通釋》“早是”條（二），語文出版社 2002 年，1349 頁），但寫作“昨是”的目前所知僅此一見，上揭王學奇、王靜竹書未言及。

²⁷ 不答緊=不打緊，也是口語音變的真實記錄，猶言不要緊、無關緊要。

席來，却不將一箇馬來販賣|用熱²⁸多軍馬去守|恁這使臣每呵，我這裡說的言語，到那里件件說不到，乍麼²⁹算使臣！等等。其中對“團”和“纏”兩個平聲字一注“上聲”，一注“去聲”，不知為何人所注，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一定是口語中的實際讀音，怕人誤讀，所以才特地注明。此外像“提防”、“提備”寫作“隄/堤”而不寫成“提”，也是口語音的準確記錄。還有一些詞彙可能帶有南方方言的色彩，如“我從二十四歲上，紅軍內住子三年”，這個“子”相當於北方話的“了”，是個南方方言詞，至今仍活在吳語中，不可能為“漢兒言語”所具有。如果說這些資料曾經過“轉寫”，那為什麼不把它改掉呢？這些白話資料中諸如此類的語言現象不少，值得專門研究，這裏就不展開來說了。³⁰

三是這些談話中雖然有一些所謂的“漢兒言語”成分，如張文討論過的俺、麼道、阿的/兀的、V 歸/V 給、了也、V 了 O 也、NP 根底 VP、時態助詞“來”、表原因的“上頭”、句末“有”字等等，³¹但是並不多（集中在幾篇，朱棣的口諭中已經不見），整體風格跟明初的其他口語文獻如《劉仲璟遇恩錄》、《皇明詔令》、《高皇帝御製文》等還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張文所說的“都是當時可以溝通的比較通用的官話變體”。如果說經過“轉寫”，那麼哪些需要轉寫？怎麼轉寫？實際操作起來恐怕都是問題，也就是說，如果“轉寫”，那為什麼不把通篇都轉寫成像《高皇帝御製文集·諭西番東畢里等詔》的“漢兒言語”體，而只是作了一些零星的改動？改或不改的理由各是

²⁸ 熱=借，亦為口語音變的真實記錄，猶言如此、這麼/那麼。又寫作“惹”：洪師範是恁那裏惹大一介官人。

²⁹ 乍麼=怎麼，也應該是記的口語音。

³⁰ 可以一提的是，其中量詞“介”的用法很特別：洪師範是恁那裏惹大一介官人|為那般上頭，差幾介火者去了來|回去對國王說，一介介都送將來。這些“介”都等於“個/个”，在《訓世評話》中很常見。這種“介”在漢語中用作量詞是可以的，但通常只限於“一介”，含有輕視或自謙的意味，如“一介武夫”“一介書生”等，很少用作泛指的量詞，而且是一個文言詞，一般不用於口語。《訓世評話》中的所有用例都出現在白話部分，這種用法不合漢語習慣。在韓語中，“個”“个”“介”讀音相同，都是개，所以可以通用。《韓國漢字語辭典》“介”字條注云“國義”，釋義是“(一)个”，與“个”“個”“箇”通用，舉的例子是《萬機要覽，財用編 5，燕使，資咨官》：“盤纏（長煙竹二十介）。”（卷一，237 頁）可見這應該是朝鮮語的用法。參看汪維輝（2003/2007）。這個問題這裏暫不討論。

³¹ 這些成分的情況各不相同，並非都是只出現在“漢兒言語”體文獻中，比如張文指出：“《吏文》、《遇恩錄》、《皇明詔令》中的明初白話聖旨第一人稱代詞都用‘我’，沒有‘俺’。《高皇帝御製文·諭西番東畢里等詔》用近似硬譯體的漢兒言語寫成，所以其中只有 1 例‘我’，其餘都是‘俺’，和 1 例‘俺每’。在《高麗史》《太祖實錄》中出現少量‘俺’。”但是我們上面所引的文獻中就有葛貴自稱為“俺南方人”的反例。這些問題這裏不能詳論，太田辰夫先生在《〈老乞大〉的語言》和《關於漢兒言語——試論白話發展史》兩篇文章中多有論及，可以參看。

什麼？這些問題都不容易解釋。

那麼其中存在的那些“漢兒言語”成分究竟應該怎樣看待呢？我認為這是明初口語受到“漢兒言語”影響的真實反映，並非人爲“轉寫”所致。這就牽涉到下面一個重要的問題。

第二，朱元璋爲什麼會說這種“漢兒言語”？元代的“漢兒言語”其通行地域究竟有多廣？

上世紀 50 年代初，太田辰夫先生在《〈老乞大〉的語言》（1953）和《關於漢兒言語——試論白話發展史》（1954）兩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並討論了“漢兒言語”的問題，半個多世紀以來遂成爲近代漢語研究的一個熱點。³²太田先生（1954/1991）認爲“把‘漢兒言語’看作是廣義的‘漢兒’間的共通語這樣的看法比較合適”（183 頁），“宋代可作爲口語資料的有詩、詞、話本、禪家及儒家的語錄、諸宮調等，但最接近口語的，仍是這種‘漢兒’及其統治者的話語。這種情況說明，口語跟北朝時一樣是由樸素主義的北方民族及其統治下的漢人正式使用的。這種口語即‘漢兒言語’，它在‘漢兒’中間使用，也在北方民族和‘漢兒’之間使用，這是不言而喻的。但令人喫驚的是，即使在母語各異的北方民族中間它也被作爲共同語，並且連極僻遠的地方也可以通行。”（198 頁）他又說：“元代的‘漢兒言語’明初似乎還保持着繼續變化的餘勢。依據《元秘史》的總譯或《老乞大》《朴通事》³³以及方才舉到的《正統臨戎錄》同一時期的同類文獻³⁴，可以窺見明初的態勢。不久‘漢兒言語’消亡了，但其中一部分似乎變成普通話被繼承下來。”（205 頁）這就可以解釋爲什麼明初的皇帝和官員們會用這種帶有漢兒言語色彩的漢語來應對高麗、朝鮮的使者了：這應該就是當日外交場合使用的口語。如果我們承認這些白話聖旨都是口語的實錄，那麼可以看出來朱元璋說這種話是相當“溜”的，這可能有他作爲統治者的個人因素³⁵，但是從官員們也說這種話來看，我們寧可相信這種“漢兒言語”體漢語在明初的朝廷中並非只有個別統治者能說，而是普遍使用的。³⁶所以這些白話資料可以進一步證明這種“漢兒言語”明初可

³² 可參看竹越孝（2008）3.1 部分及金文京（2005）等。最新的研究則可以參看李崇興、祖生利、丁勇合著的《元代漢語語法研究》第九章《元代的“漢兒言語”》。

³³ 原注：二書似均形成於元代，但經明代修改過。

³⁴ 原注：例如《北使錄》《北征事蹟》《正統北狩事蹟》等。

³⁵ 朱元璋作爲一代開國君主，征戰多年，接觸的人物廣泛，他會說前代的通語應該是不成問題的。

³⁶ 其實要學會這種“漢兒言語”並不困難，正如李崇興等（2009）所指出的那樣：“同‘純漢語’相比，‘漢兒言語’顯然融入了大量的異族語成分，明顯不合規範；同‘蒙式漢語’相比，由於並不存

能仍在沿用，³⁷而且範圍可能不限於狹義的北方地區。³⁸

那麼又該如何解釋這些白話聖旨跟《劉仲璟遇恩錄》、《皇明詔令》、《高皇帝御製文》之類的文獻中所記錄的朱元璋的語言所存在的差異呢？我想可能的答案是，朱元璋他們同時會說兩種話，在需要用“漢兒言語”的場合說“漢兒言語”³⁹，在一般場合就只說他們的“純漢語”（當然難免會帶有方言的印記）。目前這還只是一種大膽的推測，尚需具體史料來證明。張文說“研究中應該對這些文獻中反映出的語言特點和其他文獻區別對待”，這無疑是對的，但這些特點形成的原因並非“將明初通行的白話翻譯成具有漢兒言語特點的文書”。要之，我認為不宜因為這些文獻中出現了一些“漢兒言語”體的語言現象就全面否定其作為明初口語資料的價值。

二、有關漢語教學的資料

李朝立國以後，“事大”成為基本國策之一，學習漢語是國家大事，由於漢語水平差而得罪天朝皇帝的使臣，往往會受到天朝的嚴厲懲罰，史不絕書。因此朝鮮王朝繼承高麗王朝重視漢語學習的傳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於建國第二年（太祖二年，1393 年）即設立司譯院，專司口語應對及翻譯人才的培養，又設承文院，專司漢文文書。這方面的情況《李朝實錄》多有記載，成為今日研究世界漢語教育史的第一手資料。下面分兩點略作介紹。

在底層干擾，所以其中的蒙古語句法表現要簡單機械得多，不像‘蒙式漢語’那樣呈現出紛紜複雜的個體差異。”（260 頁）

³⁷ 張文在比較了幾種文獻中句末“有”字的使用情況後也說：“我們推測，大約明初漢語中漢兒言語的影響還是存在。由此可見，句末‘有’作為比較明顯的漢兒言語特徵雖很快被淘汰了，但在一定時期內還在使用。”

³⁸ 李崇興等（2009）指出：“元代甚至更早，北方地區存在‘漢兒言語’這一漢語變體，應是不爭的事實。那麼，元代‘漢兒言語’究竟在多大的地域範圍和怎樣的言語社團中通行，或者說‘漢兒言語’和‘純漢語’的畛域何在，則是不容易回答的問題。”（261—262 頁）他們認為：“元代‘漢兒言語’通行的範圍，應該主要是在蒙古人分布集中的地區，即兩都、京畿及河北、山東、河南等某些地區。”（262 頁）“……因此上述這些地區的‘漢兒言語’大概只在一定的區域和社團範圍內通行，其勢力並未强大到足以將‘純漢語’整個兒排擠出該地區，並取而代之成為該地區所有社團成員日常生活的第一語言。”但在這裏作者加了一條腳注：“但這樣臆測，也許有過於低估‘漢兒言語’勢力的危險。……另一方面，即使在‘純漢語’統治的區域，‘漢兒言語’的身影也時或可見。例如：‘打聽的兄弟哥哥有時候，忙離了許州。’（千里獨行，二折）‘元來廣寒殿嫦娥在這明月裏有。’（漢宮秋，二折）”（263 頁）從朝鮮文獻裏記載的這些明初白話資料來看，“漢兒言語”的勢力可能曾經遠及南方的江淮流域。

³⁹ 可能不一定很地道，只是帶有那樣的色彩而已，屬於一種模仿，正如李崇興等（2009：264）所說，“只是吸收了‘蒙式漢語’中具有特徵性的成分”。

1. 關於明清時期“官話”的記載

漢語自古方言分歧，朝鮮人要學習的是標準漢語，也就是朝廷使用而且能通行全國的“官話”。《李朝實錄》中對漢語的稱呼有：漢語（322 見），華語（86 見），漢音⁴⁰（38 見），官話（3 見）；還有“漢兒話”和“漢人言語”，均僅 2 見，出現在明初；今天韓國稱漢語為“中國語”，《李朝實錄》中僅 2 見，可見這個稱呼並非朝鮮對漢語的習慣叫法，有可能是從日語借入的。《李朝實錄》中沒有“漢兒言語”，但是更早的《高麗史》中却有（見上面第 3 段引文）。下面酌引幾段相關的記載：

宣諭聖旨曰：朝鮮國王，我上出氣力。洪武二十一年，你小國軍馬到鴨綠江，起將來打這中國。那時節，李（諱）一發回去。如今得了王，高麗國改號朝鮮，自然天道。朝鮮國王至誠，如今兩國之間，秀才每戲弄，不直不正。以小事大，事事都要至誠，直直正正。日頭那裏起那裏落？天下只是一箇日頭，慢不得日頭。你那裏使臣再來時，漢兒話省的著他來，一發不省的不要來。我這裏孫兒，朝鮮國王孫兒做親肯的時節，著他漢兒話省得宰相來。我這裏說歸他。先來的四箇秀才裏頭權近看的老實，放回去。這話朝鮮國王說與他。那三箇新來的一箇饒不得。你這幾箇都回去，留下的四箇行力，一發都將去。（太祖 11 卷，6 年（1397 丁丑/明洪武 30 年）3 月 8 日）

奉聖旨：今後差使臣來時，要通漢人言語的來，不通漢人言語的不許來。（同上）

柳灝齋進啓本，雖曹庶所寫，只依舊本字樣寫進，未知近年有合回避字樣，以致差誤，豈敢故安譏侮字樣！郭海龍專不識字，粗習華語，俾押送曹庶去。某豈敢教他打聽？某若有此，天地鬼神，豈肯容之？招裏指攀尹須、尹珪、孔俯三人，都不通中國語音，雖會寫字，又不深知文義，竝不曾管寫啓本，只是同在一衙行，以此指他。（太祖 14 卷，7 年（1398 戊寅/明洪武 31 年）6 月 3 日）

流前軍資監曹士德於春州。初，判漢城府事李行，以計稟使入朝，還傳宣諭曰：“童猛哥帖木宜發赴京。”朝議未決。既而聞猛哥帖木已自赴京，乃急遣李玄，及猛哥帖木未至，徑奏之。禮部官曰：“宣諭之旨，本不如此。”乃以錄本示之⁴¹，移咨本國曰：“李行誤傳聖旨矣。”憲府劾問行，行曰：“吾不曉華語，惟憑舌人耳。其時日錄具在，可考也。”又劾曹士德，士德曰：“與李行面奉宣諭，非誤也。”憲府啓：“士德誣妄訛傳，李行不質諸禮部，偏信士德之言。乞治其罪。”上以行憑舌人之言，

⁴⁰ “漢音”有時指“漢語”，有時則僅指漢語語音。

⁴¹ 據此可知當時皇帝的口諭都是有“錄本”的。此類文書保存於中書省。參看張全真（2005）。

只流士德。(太宗 11 卷, 6 年(1406 丙戌/明永樂 4 年) 1 月 28 日)

置文官訓導於司譯院。政府啓: “司譯院學生, 唯傳習漢音, 若義理則全不通曉。自今以文臣爲訓導官, 兼用本國語音教訓義理。” 從之。(太宗 25 卷, 13 年(1413 癸巳/明永樂 11 年) 6 月 8 日)

迎接使報: “使臣言: ‘致祭時祭文, 令知漢音者高聲開讀。’ ……” (世宗 8 卷, 2 年(1420 庚子/明永樂 18 年) 4 月 6 日)

戊子, 流呂義孫於珍島。義孫至日本, 適大明使臣至, 義孫譯者黃奇, 能通華語及日本語, 乃爲明使奪去。……(太宗 11 卷, 6 年(1406 丙戌/明永樂 4 年) 2 月 27 日)

頭目葛貴見《直解小學》, 曰: “反(翻)譯甚好, 而間有古語, 不合時用, 且不是官話⁴², 無人認聽。右《小學》一件, 送副使處, 令我改正, 則我當齎還燕京, 質問以送。” 上命右承旨成倪齎《直解小學》一件, 贈副使。(成宗 158 卷, 14 年(1483 癸卯/明成化 19 年) 9 月 29 日)

乃欲用上威下靈之麗舟, 難以不通官話之麗民, 是未戰而勝敗已決於堂上矣。(宣祖 98 卷, 31 年(1598 戊戌/明萬曆 26 年) 3 月 27 日)

頒鑄字所印《老乞大》、《朴通事》於承文院、司譯院。此二書, 譯中國語之書也。(世宗 64 卷, 16 年(1434 甲寅/明宣德 9 年) 6 月 21 日)

都承旨玄碩圭啓曰: “知經筵事姜希孟言: ‘《大學輯釋》《語錄》, 乃中國語也, 殿下覽之亦好’, 請無遺進講何如?” 從之。(成宗 72 卷, 7 年(1476 丙申/明成化 12 年) 10 月 9 日)

《李朝實錄》中的這些記載反映了對“漢語”稱呼的歷史變遷。太田辰夫先生(1954/1991: 181-182)指出: “朝鮮很早以來作爲會話教科書使用的《老乞大》⁴³中可見到‘漢兒言語’這個詞, 即: 你是高麗人, 卻怎麼漢兒言語說的好?(奎章閣叢書第 9, 頁 3) ……這種‘漢兒言語’諺解中作‘漢語’, 又據小倉博士指出, 《老乞大》的改訂版《老乞大新釋》(1761) 及《重刊老乞大》(1795) 改作‘官話’。(《增

⁴² 此例爲“官話”一詞見於文獻之最早者(竹越孝(2008: 497)已經正確地指出這一點), 太田辰夫、魯國堯等先生均曾引用, 可見其珍貴。關於“官話”的詳細討論, 可參看魯國堯先生(1985/2003: 508-521, 730-736)。

⁴³ 按: 太田先生所據爲《老乞大諺解》本, 他未能看到古本《老乞大》; 但稱漢語爲“漢兒言語”, 《諺解》本和古本是一致的。

訂朝鮮語學史》) ”對漢語的稱呼確實有一個從“漢兒言語”⁴⁴到“漢語”再到“官話”的變化過程，大致說來，元代和明初用“漢兒言語”，明代中後期主要用“漢語”，清代以後普遍使用“官話”⁴⁵。

2. 關於學習漢語的記載

林東錫先生的《朝鮮譯學考》對此有詳盡系統的考述，所依據的主要資料即為《李朝實錄》，這裏不詳述，僅分類刺舉若干資料，以見當日朝鮮人學習漢語之種種情狀。

(1) 有關漢語教育政策方面的。如：

司譯院提調僕長壽等上書言：“臣等竊聞，治國以人才為本，而人才以教養為先。故學校之設，乃為政之要也。我國家世事中國，言語文字，不可不習。是以殿下肇國之初，特設本院，置祿官及教官，教授生徒，俾習中國言語音訓、文字體式，上以盡事大之誠，下以期易俗之効。臣等今將擬議到習業、考試等項合行事務，開寫於後。一，額設教授三員，內漢文二員，蒙古一員，優給祿俸。生徒額數，分肄習業，考其勤慢，以憑賞罰，并及教授之官。一，習業生徒，鮮有自願來者。令在京五部及各道界首府州，擇良家子弟十五歲以下天資明敏者，歲貢一人。一，每三年一次考試，勿論是無本院生徒，七品以下人，但能通曉四書、《小學》、吏文、漢、蒙語者，俱得赴試。習漢語者，以四書、《小學》、吏文、漢語皆通者為第一科，與正七品出身；通四書之半及《小學》、漢語者為第二科，與正八品出身。止通《小學》、漢語者為第三科，與正九品出身。……漢語第一科一人，第二科三人，第三科八人；蒙語第一科一人，第二科二人。通取一十五人，以為定額。若無堪中第一科者，只取第二科三人，又無堪中第二科者，只取第三科，不拘定數。一，每年都目各望，并錄三人，以漢語精通者為頭。雖差年、到數多餘，亦不許錄於語音精通人員之上，若三人俱通者，聽以差年、到數為頭。一，(隸)(肄)業三年，不能通曉漢、蒙語者，斥遣充軍。一，考試中選者，人給紅牌一通，上寫“司譯院敬奉王旨，某人可賜通事第幾科幾人出身者。年月”，上行使本院印信，提調以下具銜署名。”下都評議使司，擬議施行。(太祖 6 卷，3 年(1394 甲戌/明洪武 27 年) 11 月 19 日)

這是李朝開國第三年，司譯院提調(負責漢語教學的行政長官)僕長壽等的上書，為漢語教學製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並得以施行，為鮮初的漢語教育奠定了基礎。

⁴⁴ 包括“漢兒話”和“漢人言語”等。下同。

⁴⁵ “官話”一詞雖然如前文所說始見於 1483 年，但是明人著作中尚不多見。

禮曹據司譯院牒啓：“在前四孟朔取才，依三館例，以四書、《詩》、《書》、《古今通略》、《小學》、《孝經》、前、後《漢》、《魯齋大學》、《老乞大》、《朴通事》，周而復始，臨文講試。去庚子年，竝令背誦。然因赴京護送押送無時，使臣館通事或累朔出使，讀習無暇，且各年壯，未易背誦。請《小學》、《老乞大》、《朴通事》等書，爲四孟朔背誦，其餘諸書，依前例臨文試講。且譯學之任，言語爲大，并試之。”從之。（世宗 33 卷，8 年（1426 丙午/明宣德 1 年）8 月 16 日）

又奏曰：臣竊照小邦僻在海外，文學未精，兼又吏文、漢音不得通曉，非但人才未易成就，有礙事大之意。臣謹按，自漢、唐至宋、元朝代，新羅、高麗皆遣子弟入學肄業。其後漢人韓昉、李原弼、洪楫、偁長壽等相繼出來，訓誨子弟。上項等人俱已淪沒，如今傳習無由。漢、吏之文理會者鮮少，每遇事大文書，未諳體例，且又朝廷使臣到國，應對語言恐致差誤，深爲未便。伏望聖慈照依歷代舊例，許令本國子弟入學肄業，兼習漢、吏之文相應。未敢擅便，爲此謹具奏聞。（世祖 20 卷，6 年（1460 庚辰/明天順 4 年）5 月 11 日）

禮曹據司譯院呈啓漢學勸勵條件：“一，院祿官前銜權知三學生徒，共二百餘人，所處間閣甚小，今又別選講肄官、漢學生徒等二十人，仍聚本院，無有居止之處，令繕工監別營一廳。一，院實役奴婢，不過二十口，數多學官生徒，供給使喚不敷。居京中及京畿奴婢二百口加定，以便供給。一，院訓導官等，俱以前銜，每日艱苦仕官，非但無勸勵之方，或生怠心，教訓陵夷，以時行兼差教授訓導之職。一，院前銜權知，每日不分晴雨，（聚）（聚）會習業，積有年紀，今已通經書稍成才者頗多，然無褒貶之典，更不盡力。每日講其經書，反（翻）譯漢語，明白置簿，當其歲抄（抄），考其分數，爲頭二人，勿論東西班，別例陞轉，勸進見效。一，漢、蒙、倭三學生，俱係外方接居，裹糧爲難，漢學七十人、蒙、倭學各十五人，每日一時供給勸勵。其中欲避軍役，求屬後托，故出入一年之內，除時享忌日，以他事滿百日者充軍，卽選年少子弟充補。一，本院專尙漢音，近者取才除授之人，纔受祿俸，未滿半年，多以外官交差，常說鄉談，如說漢語者，反以欺之。自今以後，毋差外官，俾專漢音。一，《直解小學》、《老乞大》、《朴通事》等雜語，悉皆漢語根本，但讀經書，窮其義理，全不誦習，自今以後，經書、《通鑑》諸書，不必義理窮問，但式（試？）音訓正僞（譌？），大義解說，隨例給分。其《直解小學》，分爲四孟朔，《朴通事》，分爲春秋兩等，《老乞大》，分爲秋冬兩等，每當四孟朔取才時，一書皆誦者，方試他書，《小學》背誦者，倍數給分。其中年四十已過，不願背誦者，許令臨講，其熟讀者，只給粗通分數，不能熟讀者，勿試他書。如《魯齋大學》、《成齋孝經》、前、後《漢》等不緊之書，不許

并試。一，院前銜權知等，每當孟朔取才，一依典醫監例，孟朔以前實仕滿五十日者，許令取才，蒙、倭學亦同。”啓從之。（世宗 63 卷，16 年（1434 甲寅/明宣德 9 年）2 月 25 日）

這則資料記錄了世宗大王時代獎勵漢學的具體措施。

司譯院都提調申概等啓：“國家深慮事大禮重，務崇華語，勸課之方，至爲詳密。然能通華語者罕少，雖或有通者，音亦未純，每當中國來使，御前傳語，尤難其人。今觀業譯者習華語至十年之久，而不及奉使中國數月往來之熟。此無他，於中國則凡所聞所言，無非華語，而耳濡目染；在本國之時，入本院則不得已而習漢音，若常時則令用鄉語，一日之內，漢語之於鄉語，不能十分之一也。此正孟子所謂“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不可得”者也。自今本院祿官、前銜權知、生徒、講肄官、漢學生等，每至院中，一禁鄉語。上而師長僚官相與應對，下而權知生徒招呼應諾，一用漢語，大而公事議論，小而飲食起居，一用漢語，令常仕提調考察勤怠，記之於籍。用鄉語者，初犯附過；再犯囚次知一名，三犯二名，四犯三名，五犯以上，移關刑曹論罪，祿官罷職，仍一年不敘，前銜權知，一年不許取才，生徒隨其所犯，輒行捶楚。其餘蒙、倭、女真學徒，亦依此例施行。”下禮曹議之。禮曹啓：“可依提調所啓。”從之。（世宗 95 卷，24 年（1442 壬戌/明正統 7 年）2 月 14 日）

這些強制學生說漢語、不能說“鄉語”（朝鮮語）的做法有點類似於今天的外語強化訓練營，懲罰措施不可謂不嚴厲。

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國家能通漢語者少，實爲可慮。擇講肄官及生徒年少聰敏者，號稱義州迎送官，至遼東留止之時，或質問經書，或傳習語音。仍給麻布十匹、人蔘五斤，以資其行。”從之。（世宗 74 卷，18 年（1436 丙辰/明正統 1 年）8 月 15 日）

尹殷輔議：“……國家每於科舉之後，文臣年少聰敏者，選屬承文院，令習漢語、吏文，其有將來者，稱爲質正官，每行赴京，卽古金坵獻議之意也。只緣近來文臣，雖有性近者，亦不肯學習，故鮮能曉解華語者。文官中但有朱良佑耳，良佑請於赴京之行，頻數入送，與華人語言，以質所學。又擇年少有將來者，另加教誨，使之勤習漢語，有時入送宜當。第念凡干技藝，未有不待勸獎而成就者，吏文、漢語，或庭試，或殿講，特行賞格，以示崇獎之意，使自激勸何如？”洪彥弼議：“……譯官例皆無識，只解買賣等事。華使語言，則多出於文字，譯官所傳，僅得其緒餘，而意之所在，則決不能通。文官少習漢語，終可能傳語者，間送赴京之行，上教允當。”尹仁鏡議：“……國家擇年少文臣，使之習漢語，謂之質正錄，赴京每行次，稱質正官入送，法

已在矣，只舉行而已。”（中宗 102 卷，39 年（1544 甲辰/明嘉靖 23 年）4 月 2 日）

以上兩條材料提到了學習漢語的一種有效途徑，即利用出使中國的機會讓漢語教習和學生直接向中國人討教質正。

禮曹啓：“義州，朝廷使臣往來之所，而無訓導譯語之法，通譯語者甚少。請依平壤府例，置譯學訓導，聚本州及隣近各官自願生徒，教以漢文漢語，擇其成材者，量授平壤土官。”從之。（世宗 42 卷，10 年（1428 戊申/明宣德 3 年）12 月 9 日）

御經筵，謂左副代言鄭萃曰：“吏文漢語，國家所重。往者許令通事等買賣於中國，利於己者甚多，故雖一歲再往，皆不辭避。今也痛禁貿易，每當赴京，監察糾察。且近日太平館買賣禁物，并以通事知情而罪之，因此司譯院生徒皆懶學。金時遇爲司譯院提調，嚴加糾察，使生徒勤業。時遇既死，元閔生有疾，不能糾察，予甚軫慮。吏文習讀，則李兢專掌其事，但司譯院無常坐提調，令吏曹議薦。”（世宗 59 卷，15 年（1433 癸丑/明宣德 8 年）1 月 18 日）

這是世宗大王要求舉薦優秀的司譯院提調以提高漢語教學水平。

（2）有關師資和教材方面的。如：

議政府狀啓：“據咸吉道都節制使李世衡：‘捉解到被擄男子一名李相，問係遼東鐵嶺衛軍人。於正統二年九月日，被脫輪衛野人虜掠，輾轉賣訖爲奴，到來邊境，今次被捉前來。’得此，竊照：本國僻在東陞，語音與中國殊異，必資通譯，乃能傳命。在先元朝之季，漢南人韓昉、李原弼等輩，避地出來，訓誨生徒，謹備事大之任。其後本人相繼淪沒，無有教訓之者，漢音傳習，漸致差訛，慮恐儻有宣諭聖旨，難以曉解，朝廷使臣到國，應對言語理會者小（少），深爲未便。幸今李相粗識文字，漢音純正，擬合存留，傳習相應。”臣據此參詳，所有李相上國軍丁，理宜奏達存留，質正音訓。爲此謹具奏聞。”（世宗 94 卷，23 年（1441 辛酉/明正統 6 年）10 月 22 日）

這裏說籍隸遼東鐵嶺衛的軍人李相“漢音純正”，要向其“質正音訓”。實則李相的漢音未必“純正”⁴⁶，只是可以教授漢語的教師匱乏，聊勝於無而已。

先是，命迎接都監郎廳房貴和從頭目葛貴校正《老乞大》、《朴通事》。至是又欲質《直解小學》，貴曰：“頭目金廣妬我，疑副使聽讒，故我欲先還，恐難讎校。若使人謝改正《朴通事》、《老乞大》之意，以回副使之心，則我亦保全矣。”（成宗 158 卷，14 年（1483 癸卯/明成化 19 年）9 月 20 日）

⁴⁶ 下文所引資料中即有“遼東乃中國一方，語音不正”之語。

禮曹據司譯院牒呈啓：“《老乞大》、《朴通事》、前、後《漢》、《直解孝經》等書，緣無板本，讀者傳寫誦習，請令鑄字所印出。”從之。（世宗 20 卷，5 年（1423 癸卯/明永樂 21 年）6 月 23 日）

禮曹啓：“講習漢訓，事大先務，但書冊稀小（少），學者未易得觀。請姑將《朴通事》、《老乞大》各一件分送黃海、江原兩道，刊板送於校書館，印行廣布。”從之。（世祖 11 卷，4 年（1458 戊寅/明天順 2 年）1 月 19 日）

禮曹啓：“通漢語二人，差赴京使臣迎逢官，先期入送，質問《直解小學》於童太醫，其盤纏與留連時所饌之物，優給之。”從之。（世宗 63 卷，16 年（1434 甲寅/明宣德 9 年）1 月 22 日）

以上四條材料記載了對常用漢語教材《老乞大》《朴通事》《直解小學》等的校正和刊行過程，明確地記述了這些教材曾經過中國人的審訂。

（3）有關漢語正音（標準漢語）方面的。如：

召議政府六曹議曰：“今來勅書，不允子弟入學之請，自今入學中國之望則已絕，然漢音有關事大，不可不慮。予欲遣此子弟於義州，使之來往遼東，傳習漢語，何如？”僉曰：“遼東乃中國一方，語音不正。臣等以爲前所選子弟，使之仍仕司譯院，常習漢音諸書，每於本國使臣赴京時，竝差入送。如此循環不已，則漢音自然通曉。”（世宗 62 卷，15 年（1433 癸丑/明宣德 8 年）12 月 13 日）

這條材料明確地說“遼東乃中國一方，語音不正”，而要學習正音應該到京城去學。

司諫院上疏曰：……我國之人，當其年幼舌本未強之時，皆學福建省音訓，迨其年長舌本既強之後，欲同華語，入於承文、司譯院，初終異習，成效爲難。今後京中衣冠子弟八歲以上，皆聚中央一部，自幼至長，皆學正音何如？（世宗 86 卷，21 年（1439 己未/明正統 4 年）9 月 18 日）

這裏提到了“正音”（標準語）和方言（福建省音訓）之別，並提出學習“華語”必須“自幼至長，皆學正音”。

上語副使曰：“我國至誠事大，但語音不同，必學得字音正，然後語音亦正。幸今頭目官真是好秀才，予欲令質問字韻，請大人使秀才教訓。”副使曰：“我雖不言，彼必盡心矣。”命召葛貴賜酒，謂曰：“汝盡心教誨，予深嘉悅。”貴啓曰：“俺南方人，字韻不正，恐有差誤。”（成宗 158 卷，14 年（1483 癸卯/明成化 19 年）9 月 21 日）

這裏葛貴自稱“俺南方人，字韻不正，恐有差誤”，深可注意：第一，所謂“南

方”具體是指什麼地方？第二，“南方人字韻不正”，那麼按邏輯應該是北方人“字韻”才“正”，葛貴心目中的北方正音又是指那裏的語音？總之，這條記載給我們透露了明代中期漢語正音的一些綫索，值得深究。

(4) 其他方面。如：

上謂左右曰：“令通事歸遼東者，淹留傳習漢語，無乃有益乎？”許稠對曰：“通事等寓於公館，難以久留，何能廣聞漢語？今設承文院，專習吏文，然未得其效。吏文可法者，令鑄字所印之，常使承文院官吏讀習，仍建學官廳，常考學生勤慢。”上曰：“凡言語，辨通曲折，而味趣存焉，今通事等，汎言其概而已，其曲折處，不能變通，是可恨也。”（世宗 55 卷，14 年（1432 壬子/明宣德 7 年）1 月 7 日）

這是世宗大王歎恨當時的“通事”（漢語翻譯官）水平不高，不能“辨通”漢語之“曲折”。

僉知承文院事李邊、吏曹正郎金何等，以質問《直解小學》，如遼東，命給盤纏布十一匹、人蔘五斤。邊為人性鈍，年三十餘登第，入承文院，學漢語期於成効，徹夜講讀。聞有能漢語者，則必尋訪質正。家人相語，常用漢語，遇朋友，必先以漢語接語，然後言本國之語，由是能通漢語。（世宗 63 卷，16 年（1434 甲寅/明宣德 9 年）2 月 6 日）

李邊可謂學習漢語的模範，所以能編出《訓世評話》這樣別具一格的漢語教科書。

⁴⁷

癸卯，受常參，御經筵，講《左傳》。上曰：“予於經史，靡不歷覽，且今老不能記，不須讀書。今尚不輟者，只為觀覽之間，因以起意，施諸政事者頗多。以此觀之，讀書豈不有益？世子既讀四書、五經、《通鑑綱目》，人主學問，不必該博，然豈可以此為自足而間斷哉？中國語音，亦不可不知。宜令金何三日一次詣書筵，訓世子以《直解小學》及《忠義直言》，雖讀二書難通漢語，豈不愈於專不知者哉？”（世宗 80 卷，20 年（1438 戊午/明正統 3 年）3 月 19 日）

這是創製《訓民正音》的世宗大王希望自己的世子能夠學習漢語。

上護軍閔光美等六十人上言曰：“臣等竊見我國自三韓至於高麗，世世事大。高麗設漢語都監及司譯尙書房，專習華語，其時漢人來寓本國者甚多。至國初，置司譯院，如龐和、荊華、洪揖、唐城、曹正等相繼訓誨。由是親灸（炙？）習業，人才輩

⁴⁷ 參看汪維輝編《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中華書局 2005 年。

出。然學徒所讀，不過《老乞大》、《朴通事》、前、後《漢》等書而已。且其書所載，率皆俚近俗語，學者患之。判三司事使長壽乃以華語解釋《小學》，名曰《直解》，以傳諸後。今主上益勤事大，增設講肄官別齋學官，并前銜權知生徒及承文院吏文學官學生等，皆給餼廩，敦加勸勉，教養之方，至矣盡矣，而無他師範，唯以《直解》一部為習，長壽之功，至此大矣。而況中朝儒者見《直解》，皆以為解說至當，敬慕不已，則長壽之為人，可知矣。聖朝曾無褒賞，臣等竊惟憾焉。伏望殿下，特舉善善之長，錄長壽子，超陞爵秩，則不惟慰長壽於地下，實是盛朝之令典也。”命吏曹錄用其子。（世宗 93 卷，23 年（1441 辛酉/明正統 6 年）8 月 11 日）

這是對鮮初漢語教育功臣、《直解小學》作者使長壽的身後褒賞。

三、其他有關漢語漢字的資料

《高麗史》和《李朝實錄》中關乎漢語漢字的資料還有很多，筆者尚未及全面收集整理，這裏僅以“元一原”的寫法問題為例略作說明。

原來、原先、原本、原因、原由、原配、原樣、原始的“原”，在元代以前都寫作“元”⁴⁸，日語今天仍這麼寫，保存了古體。韓語則情況稍複雜，有兩寫的，如“元來/原來”“原始/元始”，有只寫作“原”的，如“原本（指原刊本，初刊本）”⁴⁹“原因”，也有只寫作“元”的，如“元配”。⁵⁰關於“原”取代“元”的時代及原因，中國文獻中最早的記錄見於明代萬曆年間的兩種筆記：

余家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想國初惡勝國之號而避之，故民間相習如此。史書無所考見，姑記之以詢之熟典故者。（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一“國初諱用‘元’字”條）

嘗見故老云：國初曆日，自洪武以前，俱書本年支干，不用元舊號。又貿易文契，如吳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蓋又民間追恨蒙古，不欲書其國號。

⁵¹如南宋寫“金”字俱作“今”字，曾見宋列帝御書及妃后翰墨皆然，則又不共戴天仇

⁴⁸ 敦煌文獻中偶見寫作“原”的，那是例外。

⁴⁹ 寫作“元本”則是另一個詞——法律術語，指“原物”。

⁵⁰ 以上韓語中的寫法承友生朴貞宣博士見告，謹致謝忱。

⁵¹ 明初人痛恨元朝而不欲提及，亦見於其他一些記載，如明陸容（1436—1494）《菽園雜記》卷三：“國初，江岸善崩。土人謂有水獸曰豬婆龍者搜抉其下而然。適朝廷訪求其故，人以豬與國姓同音，諱之。乃嫁禍於鼃，上以鼃與元同音，益惡之，於是下令捕鼃，大江中鼃無大小，索捕殆盡。”此條材料承友生劉君敬博士檢示，謹致謝忱。

也。”（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一“年號別稱”條）

清人顧炎武和郝懿行也曾論及：

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來曰元來。唐宋人多此語，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易》“原筮”，《周禮·馬質》、《禮記·月令》“原蠶”，《文王世子》“末有原”，漢“原廟”之“原”，皆作“再”字解，與“本來”之義全不相同。或以為洪武中，臣下有稱元任官者，嫌於元朝之官，故改此字。古人亦有稱“原官”者。後漢張衡《應問》：“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注：“《爾雅》曰：‘原，再也。’衡為太史令，去官五載，復為太史令，故曰原之。”然則“原官”乃再官之義也。（顧炎武《日知錄》卷三十二“元”條）⁵²

《宋書·王景文傳》：“臣遣李武之問儼元由。”懿行按：元，始初也；由，萌蘖也。論事所起，或言“元起”，或言“元來”，或言“元故”，或言“元舊”，皆是也。今人為書，“元”俱作“原”字，如官曰“原任”，詩曰“元⁵³韻”，文曰“原文”，以物質錢曰“原當”，以錢贖物曰“原價”，凡此之類，有數十條，習貫為常，不加更正。推厥所由，蓋起於前明初造，事涉元朝，文字簿書，率皆易“元”為“原”，沿至今日，習非成是，不察所安。是說也，余聞之牟默人云。（郝懿行《晉宋書故》“元由”條）

今人也續有討論。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原”取代“元”是明代以後的事，跟明人避諱有關。但是具體原因說法不一。

《高麗史》中對此事的記載屬明初的資料，時間遠早於國內文獻，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解釋，因為是當時人記當時事，應該比較可信：

辛未三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九一）夏四月己卯，避帝諱，禁用“元”字，代以“原”。（《高麗史·恭讓王世家》，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8頁）

這裏明確記述了是因為“避帝諱，禁用‘元’字，代以‘原’”。影響所及，以至於把“元朝”也寫成“原朝”，例見上文。不過在《高麗史》中更多的還是寫作“元

⁵² 李榮先生在《文字問題》一書中曾指出：“有時候，政治的理由也造成文字功用的再分配。”舉的例子就是“元”和“原”的問題，在引了顧炎武的這段話後他說：“明朝推翻元朝，明朝初年有必要避免‘元官、元籍、元來’一類寫法。‘或以為’以下大概是作者的本意。元清兩代均以異族入主中原，顧炎武有所忌諱，未便說得十分明確。‘原來、原籍’一類寫法通行之後，‘元’字一部分功能就轉移給‘原’字了。”（商務印書館 1987 年，101—102 頁）筆者謝謝劉君敬博士檢示此條材料。

⁵³ 維輝按：當作“原”。

朝”，而《李朝實錄》中則未見“原朝”的寫法，可見在朝代名稱上避諱實際上並未嚴格執行。陳垣先生在《史諱舉例·明諱例》中指出：“明承元後，避諱之法亦甚疏。據《明史》，隨從太祖諸人，有丁玉初名國珍，吳良初名國興，吳禎初名國寶，胡美初名廷瑞。《胡美傳》云：‘避太祖字易名。’然終明之世，太祖名字，並未嘗避。”“萬曆而後，避諱之法稍密。”“明諱之嚴，實起於天啓、崇禎之世。”（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7 年，120—121 頁）明代避諱不嚴，直至晚明才漸密，確如援庵先生所言；不過明初要避朱元璋的名諱，《高麗史》的記載應該是有事實根據的。據此看來，明人改“元”為“原”，跟明初避太祖名諱可能也不無關係吧。

“《老乞大、朴通事》的语言”国际 学术研讨会综述

夏凤梅¹

【摘要】2010年6月12日—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联合举办的“《老乞大、朴通事》的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桐庐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等共4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围绕“《老乞大、朴通事》的语言”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充分展示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成果。

【关键词】老乞大 朴通事 国际学术研讨会 综述

2010年6月12日—13日“《老乞大、朴通事》的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桐庐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协办，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负责具体的会务安排。有来自法国、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专家学者等共40余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是一个规格较高、规模较小的专题性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鲜明、议题

¹江汉大学人文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

集中,气氛自由和谐。与会代表主要从语言性质、语法、词汇等方面对《老乞大、朴通事》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着重讨论了《老乞大、朴通事》所体现出来的“汉儿言语”的性质以及它是否反映了当时北方汉语的语言面貌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一、《老乞大、朴通事》的语言性质

《老乞大》的语言性质问题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重点。本次会议有多位专家学者提交论文讨论此问题,如: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所的金文京教授(因事不能前来)提交的两篇论文《元代蒙文直译体和汉儿言语》和《汉儿言语考》、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区东亚系的遇笑容教授的《从对比分析看古本〈老乞大〉的语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的祖生利教授的《古本〈老乞大〉的语言性质》、日本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的船田善之教授的《古本〈老乞大〉与蒙文直译体》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和视野对此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祖生利从“一、古本《老乞大》的发现和其语料价值;二、现有的研究、成就和不足;三、学界对古本《老乞大》语言性质的不同看法;四、对于古本《老乞大》语言性质的己见;五、结论和余论”五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和解释,他认为:古本《老乞大》的语言,是元代蒙汉语语言接触的产物,反映了元代后期大都一带北方汉语(“汉儿言语”)的真实面貌,是元代后期北方汉人和汉化了了的蒙古、色目人融合成新的“汉儿”社团后共同使用的语言,其中诸多的蒙古语干扰特征都是实际语言中客观存在、真实使用的,是在经历了辽、金、元甚至更早时期阿尔泰语的持续的、接力式的接触影响下层叠形成的,具有“克里奥尔语化”的特点。

二、《老乞大、朴通事》的语法

语法方面的论文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曹广顺教授的《从古本〈老乞大〉中“上”和“行”的使用谈起》;日本同志社大学沈力教授的《从“时”演变的潮汐模式看汉语复句的构成机制——以〈老乞大〉资料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杨永龙教授的《古本〈老乞大〉的“去 VP”和“VP 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赵长才教授的《古本〈老乞大〉的疑问句》;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张赫教授的《三类元代语料中的处置式》等。

杨永龙先生的论文从古本《老乞大》中表目的“去 VP”和“VP 去”两种格式的使用频率的差异入手,对四种版本的《老乞大》进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对两种格式在

元明时期的南北差异加以考察，进而上溯唐宋乃至六朝，对“VP去”的来源和产生动因进行了揭示。

沈力先生的论文主要是围绕着汉语“时”的语法化模式的形成而展开的。“时”是按照“涨潮模式”语法化的。从南北朝的口语资料中得知它早期只做关系名词，到了唐代它又出现了假设用法，到了元明它与语气词一样有提示功能。不仅如此，“时”又按照“退潮模式”回归原来的关系名词功能。它的语法功能在元明代达到高峰之后，出现了衰退迹象。到了清代，它的提示语气消失，但还保留着假设功能；在现代北京话中，它的假设功能也不见了。论文把这种模式叫作“潮汐模式”。

张赅先生的论文主要是通过对元刊杂剧、以《老乞大》（元刊本）和直讲体文献为代表的元代汉语学习材料、以《蒙古秘史》为代表的直译体文献的三类语料中处置式的结构特点的分析来讨论元代三种语言变体的差别、“汉儿言语”是怎样受到汉语、蒙语的影响的。

三、《老乞大、朴通事》的词汇

有关词汇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方一新教授的《〈元语言词典〉补苴——以〈原本老乞大〉为例》、浙江大学古籍所王云路教授的《〈老乞大〉及〈集览〉词语杂记》、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汪维辉教授的《〈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与〈训世评话〉的词汇差异——兼论〈老谚〉〈朴谚〉的语言性质》。

方一新先生通过《原本老乞大》词语的使用调查和词义解释，对《元语言词典》在释义和收词立目方面进行补充。汪维辉先生通过考察69组常用词语在《老谚》、《朴谚》汉文部分和《训世评话》三书中的使用情况，同时结合《原本老乞大》，分析了三书在语言上的差异，解释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王云路先生的文章对《老乞大》多个版本及《老乞大集览》中的疑难词语进行了深入的考释，并探究词义产生的理据。

四、两书所涉及的方言、语音及其他相关研究

除上述研究外，对《老乞大、朴通事》所涉及的方言和语音也是会议讨论的又一话题。日本青山学院大学远藤光晓教授的《〈老朴集览〉所见〈旧本朴通事〉及其基础方言》，主要从方言语音的角度考证《老朴集览》和《旧本朴通事》中“阁落”一词的不同写法、读音及词义。汪维辉的《〈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训世评话〉的词汇差异——兼论〈老谚〉〈朴谚〉的语言性质》也涉及到江淮方言问题。

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陈辉先生的《〈老乞大谚解〉和〈无罪获胜〉比较研究》，通

过《老乞大谚解的“右音（正音）”》与《无罪获胜》的罗马字注音加以互证，并参考《老乞大谚解》的“左音（俗音）”以及利玛窦《葡汉词典》、《西字奇迹》等文献的汉字注音，通过这几种语音材料的比较，探究17世纪后半叶汉语官话的语音特征。

另外，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竹越孝教授的《一种新发现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象山题院〉的语言性质》给我们带来了又一新的汉语教科书语料。文章从其语言特征、词汇、语法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研究，这本教科书及其研究不仅对研究《老朴》的语言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对研究明代汉语也具有较高的价值。

按照主办者商定，由曹广顺教授介绍了会议筹备工作和会议议程。本次会议不设主持人，大家按照顺序发言，然后逐个讨论，气氛热烈。会议最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阿兰·贝罗贝（Alain Peyraube）先生做了总结性发言，充分肯定了本次研讨会的高效率和成功举办。

学术动态

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大西克也教授 来我中心作学术演讲

2010年1月22日下午三点,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社科系研究所大西克也教授在西溪校区行政楼二楼229室作了一场题为“上古汉语和出土文献——语言和文本的关系”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中心方一新教授主持,汉语史研究中心和古籍研究所的师生共同聆听了这场精彩的演讲。

大西克也教授主要从“对古书的改造——以避讳为例”和“字词关系的不同及文字系统的意义”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因避讳造成对古书的更改是古文献中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大西教授举了“端月”等几个秦汉时代的避讳例。针对第二个问题,大西教授分为“1.甲骨文的特殊性;2.春秋战国时期文字世界的发展及字词关系的发展;3.秦楚用字习惯的不同;4.文字统一的意义及先秦文本的性质”四个方面逐次论述,认为先秦的文字系统并不能全部反映当时的语言情况;他把先秦文字(就目前的出土文献)分为楚、秦两大系统,并举例分析了这两个系统中存在着用字的不同以及秦时文字统一对当时的文本书写产生的影响。报告指出作为“同时资料”的出土文献,是“后时

资料”传世文献的重要补充，在上古汉语语言文字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报告结束后，参加讲座的师生同大西先生进行了讨论。

大西克也教授目前主要致力于出土文献的语言文字方面研究。

许建平教授 赴台湾东吴大学任客座教授

应台湾东吴大学之聘，我中心许建平教授于 2009 年 9 月至 2010 年 1 月，在中文系担任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讲授《敦煌学研究》及《礼记》。

许建平教授在台期间，参加了 11 月 6、7 日由东吴大学中文系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英俄所藏敦煌〈毛诗音〉写卷的文献价值》，对收藏在英俄的敦煌《毛诗音》写卷从由异文考探写卷之文献价值、由音注考探写卷之文献价值两个方面作了探讨，获得了讲评人的高度赞扬。

许建平教授还应邀作了五次演讲：

10 月 19 日：东吴大学中文系，题目“敦煌《诗经》写卷与中古学术史”；

12 月 1 日：东吴大学图书馆，题目“大陆文史类出版品的现状”；

12 月 21 日：台湾大学中文系，题目：敦煌文献中的《尚书》写卷；

12 月 28 日：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题目：敦煌文献中的经部典籍；

1 月 4 日：暨南国际大学，题目：经学研究的新材料。

演讲内容主要是许建平教授近十年来关于敦煌经学方面的研究重点与心得，着重谈的是经籍写卷的价值、到目前为止的研究状况以及可以进一步开拓的研究题材，引起了听众的高度兴趣与关注。

许建平教授还应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林庆彰教授之约，为《国文天地》杂志撰写了《图书馆查书的经历与我的学术取向》一文（发表在《国文天地》第 25 卷第 9 期，2010 年 2 月），为台湾学者介绍了大陆重要的大型数字图书网站，供大家快速便捷地获取学术数据的方法。

于细微之处发现问题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刘丹青教授 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一）

应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之邀，2010年3月15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语文》副主编，博士生导师刘丹青教授来中心作了题为“汉语特色的量化词库——多/少二分与全/有/无三分”的学术报告。报告由方一新老师主持，汉语史研究中心和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的众多师生在行政楼229室聆听了报告。

刘丹青先生主要从事汉语方言语法和语言类型学研究，本次报告的题目则首次接触到形式语义学。刘先生从类型语言学的角度对比了汉、英两大语系的量化系统的不同，指出汉语具有多/少二分与全/有/无三分两大体系，而英语却是典型的三分系统（all、every、each等/some、several等/no、nobody、none等），并列举了在汉英对译中量化词翻译失真的大量例证；量化表达有两种策略，即“精确词语的模糊用法”和“模糊词语的精确用法”，这些都跟人类自然语言的表达有关。报告从认知和语义的角度重点分析了现代汉语通语和一些方言中三分量化系统和二分量化系统中一些有代表性的用词，例如可能受英语影响产生的全量否定词“任何”，跨越“少一无”界限的谓词后面的“什么”，跨越“多一全”界限的主观量化词“各”、“大家”、“广大”等。报告指出这是一个有待深化的研究课题，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当中。另外，刘丹青先生指出汉语缺少普通语言学的关照，这方面亟待加强，这需要汉语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刘丹青先生的报告内容丰富，生动诙谐，一口气讲了近两个小时。方一新老师点评指出：“刘先生学术视野开阔，理论素养高，善于从寻常处发现研究课题，语料收集不拘一格……”在讨论的环节，师生们与刘先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都认为获益匪浅。

从小切入点引出大问题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刘丹青教授 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二)

2010年3月16日上午,继前一天的报告之后,刘丹青教授在汉语史研究中心又作了一场题为“汉语史语法类型特点在现代方言中的存废”的学术报告。报告由汪维辉老师主持。

刘丹青先生从事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已有二十多年,他认为已往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古代汉语语法在现代汉语方言“存”的部分,较少提及消失的部分(即所谓“废”)。他从语法现象的存废两方面入手,探讨汉语语法类型的历史演变。刘丹青先生首先介绍古代汉语语法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留存现象,列举了古代汉语中代词没有单复数之分、存在VOR动结式、宾语之后的体助词、完整体和持续体共用体助词等四个特征,并举现代汉语方言中存在的实例予以说明,用生动鲜活的例句反映了古汉语语法的留存现象。其次,刘先生介绍了古汉语语法在跨方言的消失现象。他经过研究比较,发现有以下六种情况:代词宾语的有条件前置、否定代词和否定介词、关系代词、数词+名词、名词直接作判断句谓语作为判断句的基本类型、比拟性名词作状语,这些是在跨方言材料中找不到例证的类型特点,属于上古汉语语法的类型特点。最后,刘先生还以上古汉语“而”和老上海话“啵”为例,说明语法特征存废判断的复杂性。刘丹青先生的报告以小切入点挖出大问题,内容丰富,结构严谨。在场师生对这一课题很感兴趣,与刘先生展开讨论,气氛轻松活跃。

吉林大学吴振武教授 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4月22日下午2:30,著名古文字学家、吉林大学副校长吴振武先生如约来到行政楼239室,为广大研究生同学讲了一场题为“古文字与训诂”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方一新老师主持。吴先生把他的讲演分为三个小段,即三个小故事,分别是“齐之大刀”、“伐器”与“越王古戈铭文释论”。齐国古刀币上的“齐之大刀”曾被人误识为“齐之法货”,经过吴先生考证,齐国古文字喜欢在原字的基础上加声符,“刃(刀)”即是一例,并横向对比了赵国等国刀币上“刀”字,又结合传世文献对刀币的记载,证实了读为“大刀”的正确性。“刀”的正确释读还有助于解释韩国出土的铭文“戟刃”实为“戟刀”,由此又进一步解说了“戟”、“戈”的区别,并解释了楚国称“戈”为“藁(果)”的依据。在第二个故事里,吴教授用相因生义的理论并实物论证了“伐器”应义为“治器”,解决了悬置多年的疑问。吴先生是杭州人,这次他特意为大家准备了第三个故事——“古越国青铜戈铭文的释论”。有意思的是,国内包括吴先生在内的四位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曾对这块精美古戈上的铭文释读,结果结论却大相径庭,吴先生解读了他的释读,并重点阐释了“退居”乃死之讳称的依据。吴先生所讲内容虽然大多是复杂难辨的古文字,但先生思维严密,每每又配以实图,娓娓道来,生动有趣。

这是吴教授第二次来我中心讲学。吴教授长期从事古文字研究工作,他始终站在学术界的前沿,研究成果说服力强、学术价值高,在文字学界享有较高的声誉。此外,吴教授还身兼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会长、中国文字学会常务理事等社会职务。曾获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等荣誉称号。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讲座结束后,在场聆听的师生们就相关问题与吴振武教授进行了讨论,大家都觉得从吴老师的研究方法和论证思路等方面受益很多。

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 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4 月 23 日下午，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王宁先生来我中心作了题为“关于汉语词汇研究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报告由方一新老师主持，中心多位师生认真聆听了报告。

王宁教授致力于词汇研究多年，造诣很深。在研究方法上，她认为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词汇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大变化：一是词汇研究以构词为中心转向以词义变化为中心；二是从寻求个体词的演变发展到对总体词汇系统的关注，特别关注构词方式、词与词的牵连等问题，逐渐有了词汇史的观念；三是从对词汇外部的描写到对词汇内部系统的解释，多数学者是从西方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实现这种词汇内部解释。王宁教授充分肯定了词汇研究的重要性和广阔前景。她认为对汉语词汇研究的认识应当再向前发展，应该认识到汉语里的新词新义随时可能死亡，旧词旧义随时可以复苏，对专书的词汇研究不能代替当时的语言现象；而且词汇研究要注重泛时现象，应该做到局部共时、局部历时和泛时的相结合；再者，“文体论”要介入词汇研究，不能忽视书面语对口语的影响。

王宁教授以自己从事词汇研究的亲身体会总结了近年来词汇研究的变化，并提出了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令在场师生获益良多。

中心三位教授 参加国际中国语学会年会

2010 年 5 月 19 日至 22 日，汉语史研究中心方一新、汪维辉、王云路教授参加了由美国哈佛大学语言学系承办的“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 18 届年会（IACL-18）暨北

美洲汉语语言学第 22 次会议”，三位教授提交给会议的论文分别是《从〈抱朴子〉4 组名词看中古基本词的更替演变》、《汉语史上基本层次范畴“上位化”现象初探》和《关于“三字连言”的重新思考》，三位教授均被邀请担任分会场主持人。这个年会由国际中国语学会主办，通常由欧洲、美洲、亚洲的相关高校或研究机构轮流召开。我国此前已经由南开大学（2004 年）、北京大学（2008 年）承办过。据悉，下一届年会将由南开大学承办。

中国社科院沈家煊研究员 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应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之邀，2010 年 5 月 23 日下午 3 点，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沈家煊先生来浙江大学讲学。沈先生的讲座在西溪主教 259 会议室进行，由彭利贞教授主持。中文系数十位博士硕士及来自兄弟院校的师生共同聆听了沈先生的精彩报告，此次报告的题目是《英汉否定词的分合和名动分合》。

沈家煊先生首先以莎士比亚的名句及赵本山的小句台词轻松开场。在揭示了语言中存在的“名动分立”和“名动包含”两种关系后，沈先生逐一考察了英语中的 *no* 和 *not*、法语的 *nul/nulle* 和 *ne*、汉语的“不/弗”和“毋（无）/勿”以及“没/无/未”和“不/非”。由此可以说明汉语的名词和动词都能用同一个否定词“没”或“无”来否定，汉语注重区分“有”和“是”。而和汉语相反，英语里 *be* “是”和 *there be* “有”不怎么区分，注重的是“有没有这样东西”和“有没有这件事”的区分，所以英语首先区分的是“否定名词”和“否定动词”。沈先生强调，汉语中名词与动词是一种名动包含的关系，讲汉语语法不应过分注重名词和动词的区分，否则会使我们把宾语和补语对立起来，造成汉语语法体系的不协调、不一致。报告最后，沈先生还耐心回答了在场师生提出的相关问题。

沈先生的论证视角独特，以小见大，从语言事实出发，深刻揭示了汉语与印欧语的重大不同，并指出，类型学研究能使我们更好地对汉语中的各种现象作出合理解释。

我中心两位硕士生 论文全省抽检获优秀

近日人文学院网站上贴出消息《喜报：我院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论文的抽查成绩居全省高校第一》，公布了刚刚完成的针对全省 2008 年硕士论文所作的抽检结果。结果表明，中国语言文学系一级学科硕士学位论文抽检成绩居全省高校第一，共有 4 篇论文获得 90 分以上的优等评价，分别占全省总数的 33.3%和全校的 44.4%。在学院的获优论文中，我中心有两位研究生的论文荣列其中，占全院的 50%，成绩骄人。具体文章是：

论文题目：《王三》介音及相关问题探究

评分：93

学生姓名：田奉良

专业：汉语言文字学

指导教师：黄笑山

论文题目：“不大”词汇化研究

评分：90.7

学生姓名：张龙

专业：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指导教师：池昌海

论文题目：《后汉书》李贤注引《三礼》研究

评分：93.0

学生姓名：潘薇妮

专业：

指导教师：许建平

许建平教授应邀参加 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 ——纪念向达教授诞辰 110 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

由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教授诞辰 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010 年 6 月 16 日至 17 日在国家图书馆文会堂召开，40 余位中外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我中心许建平教授应邀出席了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校议》。

本次会议的主旨是纪念我国现代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敦煌学家向达教授诞辰 110 周年。向达教授于 1935 年秋受国立北平图书馆委派，以交换馆员身份赴欧洲考察流散到英、法、德等国的敦煌西域文献、壁画以及太平天国文献。1938 年秋携带抄录的数百万字资料回国，为我国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成为当时敦煌学的领军人物。1939 年春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当年秋转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兼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1941 年至 1944 年，两次赴西北进行学术考察，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连带的几个问题》，提议将千佛洞收归国有，对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的设立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建国后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二所副所长兼学部委员。

在本次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涵盖了向达先生对敦煌学发展的贡献、敦煌文献研究、敦煌考古、丝路历史与中外关系、佛教美术等专题，展示了近年来敦煌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研究生动态

汉语言研究所第三届研究生论文报告会圆满结束

5月17日，汉语言研究所第三届研究生论文报告会在西溪校区主楼351室成功举行。经导师推荐，共有9名博士生、6名硕士生参加这次论文报告会。汉语言研究所的池昌海、方一新、黄笑山、汪维辉、颜洽茂、陈东辉、彭利贞、王小潮、姚永铭、杜轶、真大成等十余位评委老师和全所的硕、博士研究生同学参加了论文报告会。

博士生同学的报告上午8时30分准时开始，由所研究生会的博士生王浩垒同学主持。9位博士生以姓氏拼音为序，先后报告。每人先陈述10分钟，接着由评委老师和同学们提出问题，报告人现场答辩，时间也是10分钟。报告人及题目是：和谦《中古及近代词语札记二则》、康振栋《论汉译佛经外来词资格的不平等性——以“意译词”的归属问题为中心》、孙越川《词汇扩散中的音变竞争研究——以四川西南官话古泥来疑母的音变为例》、王浩垒《汉语动词“遮”掩饰义的产生及相关问题》、王丽香《总括范围副词“都”与“一概”的知行言三域》、辛彩凤《武城方言日母字今音：层次和演变》、谢维维《论北京话古鱼部字 a、u 两读并存的现象——基于语音语义配置关系的考察》、张龙《“好了”的语法化和主观化》、张薇《“怪不得”之“醒悟义”的产生》。

这一场次的报告一直过了 12 时才结束。

硕士生同学的报告会下午 1 时开始，由研究生会的硕士生施含笑同学主持。每人的陈述时间为 7 分钟，答辩时间为 8 分钟。报告人及题目是：路方鸽《〈居延新简〉校释三则》、潘丽娟《动词情状与“V 倒（不/没）V”格式》、史学明《沈兼士文字训诂思想接受史浅探》、叶敏佳《范寅〈越谚〉文字研究》、曾艳《“怎么”得到致使解释的认知分析——在“体”范畴视角下的思考》、俞凡《论数据库专家系统在音韵学研究中的应用——以一个音韵地位随文插注系统为例》。

报告会现场气氛非常活跃，除评委老师提出意见外，台下的研究生同学也积极参与讨论。报告的论文涉及文字、音韵、方言、训诂、词汇、语法、语义以及语言与计算机应用等诸多方面，基本涵盖了当前汉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报告会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获益良多，这次未能参加报告的同学则有“相望试登高”的憧憬，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参加下一届的报告会。

我所的研究生论文报告会原来隔年举行一次，目的是秉承求是学风，开拓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气氛，加强师生、同学们之间的交流。据了解，所里已经决定，从 2011 年起，汉语言研究所的研究生论文报告会将改为每年一次，在下半年举行。浙江大学汉语言研究所的语言学研究历史悠久，基础深厚，在海内外有较高的知名度。论文报告会的举办，体现了全所老师对硕、博士研究生成长的关心和呵护。

报告会结束后，评委老师经过集体评议，共评出博士生优秀论文二、三等奖和优秀奖三个奖项（一等奖空缺），硕士生优秀论文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四个奖项。所里将会对获奖同学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以资鼓励。

我中心举行 2008 级古代汉语硕士 毕业论文答辩会

2010 年 5 月 31 日下午 1 点 30，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在西溪校区行政楼 314 室举行了 08 级古代汉语方向硕士毕业论文答辩会，答辩委员会由王云路、方一新、黄笑山、陈东辉、姚永铭五位专家组成。参加答辩的十一位同学都做了充分的准备，顺

利通过答辩。

汉语史研究中心聘请浙江大学古籍所副所长、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云路教授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本中心专家方一新教授、黄笑山教授、陈东辉副教授、姚永铭副教授担任答辩委员。答辩委员会五位专家治学严谨，严格把关，仔细审阅了参加答辩的论文，从宏观、微观不同角度提出了许多具体的问题和宝贵的建议。

参加答辩的同学、论文和导师情况如下：

陈发捧	汉语方言虚词音变分析	黄笑山教授
崔地希	论韩语汉字词的比较	方一新教授
房婷婷	山东莱芜方言语音研究	陈忠敏教授
路方鸽	《居延新简》语词研究	方一新教授
朴初源	中韩汉字词对比研究	黄笑山教授
史学明	论沈兼士文字训诂学成就	陈东辉副教授
王欢欢	灵宝方言研究	黄笑山教授
闻胜海	《贤愚经》后置方位词研究	颜洽茂教授
叶晓芬	《唐语使用》所载近代汉语语音分析	黄笑山教授
张 艳	魏晋南北朝简纸文书词语考释	方一新教授
赵永超	古代汉语“快速”语义场研究	颜洽茂教授

本次答辩从下午一点半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半，答辩委员会经过讨论，认为各位同学的论文均已达到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全票通过论文答辩，并一致建议授予硕士学位。

我中心四位博士 顺利通过夏季博士论文答辩

6月1日上午八点半，汉语史研究中心夏季博士论文答辩会在西溪校区行政楼229室举行。答辩委员会由王云路教授（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黄笑山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汪维辉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方一新教授（浙江大学汉

语史研究中心)、池昌海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五位专家组成,其中,答辩委员会主席由王云路教授担任。姜黎黎、凌瑜、[泰]邢晓姿、熊娟四位博士生参加了答辩,她们的答辩论文题目依次是《〈摩诃僧祇律〉单音动词词义演变研究及认知分析——以经济、生活、司法类中的典型概念场为例》(导师:方一新教授)、《〈史记〉篇章连接标记研究》(导师:池昌海教授)、《汉泰喻体及其翻译策略对比研究》(导师:方一新教授)、《汉文佛典疑伪经研究》(导师:颜洽茂教授)。中心的硕、博士研究生同学旁听了本次答辩。

答辩会持续到中午十二点才结束。答辩专家就每位博士生的论文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提问,并提出了极富见地的建议。答辩同学认真地回答了问题。答辩委员会对各位同学的答辩表示满意,经答辩委员会投票表决,一致同意四位博士通过论文答辩,并建议授予博士学位。最后,答辩委员会主席王云路教授宣读了答辩决议。

我中心举行 2008 级现代汉语硕士 毕业论文答辩会

2010 年 6 月 2 日上午 8 点,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在西溪校区行政楼 314 室举行了 08 级现代汉语方向硕士毕业论文答辩会。答辩委员会由徐越教授(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池昌海教授(浙江大学汉语言研究所)、彭利贞教授(浙江大学汉语言研究所)、王小潮副教授(浙江大学汉语言研究所)四位专家组成,其中,答辩委员会主席由徐越教授担任。

参加答辩的学生、论文题目及其导师情况分别如下:

- | | | |
|-----|------------------------|--------|
| 曹卫明 | 《近三十年流行语研究》 | 王明华副教授 |
| 陈美英 | 《泰国高校初级汉语综合教材语法项目选编研究》 | 彭利贞教授 |
| 冯海丹 | 《复式新闻标题小标题间的关联模式》 | 池昌海教授 |
| 李新良 | 《现代汉语叙实词语研究》 | 彭利贞教授 |
| 梁 政 | 《现代汉语示证范畴研究》 | 彭利贞教授 |
| 刘 哲 | 《形容词性状语的语义指向研究》 | 王小潮副教授 |

徐美玲 《情态动词“能、会、可以”与 DAI 的对比研究》 彭利贞教授赵 旭
《现代汉语处所宾语研究》 池昌海教授

朱 云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探析》 王明华副教授

左翠玲 《电视剧〈双面胶〉中主要人物负面言语行为藉以产生的表达方式》 池
昌海教授

答辩过程中，各位专家对各位同学的论文谈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修改建议。各位答辩的学生认真回答了专家的问题。经答辩委员会投票表决，一致同意十位同学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并建议授予硕士学位。整场答辩持续四个半小时，最后答辩委员会主席徐越教授宣读了答辩决议。